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获得公正诉讼的权利
(民事部分)

公约第六条适用指南

COUNCIL OF EUROPE



CONSEIL DE L'EUROPE

出版商或有关组织希望出版或在网上公布（或翻译）本报告的，请联系 publishing@echr.coe.int，咨询相关信息。

©欧洲理事会/欧洲人权法院, 2013

本报告可于以下地址下载www.echr.coe.int (Case-law – Case-law analysis – Case-law guides)

本报告由研究部提供，对法院没有拘束力。报告于 2013 年初完成，判例法参考部分于 2013 年 5 月 1 日更新。

目录

介绍	4
I. 适用范围：“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概念	5
1. 公约第6条第1款的一般适用条件.....	5
(a) “争端（DISPUTE）”的概念.....	5
(b) 国内法中存在争议涉及的权利.....	6
(c) 权利的“公民”本质.....	7
(d) 权利的私人属性：从金钱的视角.....	7
2. 对其他争端形式的延伸适用.....	8
3. 公约第6条对非主体诉讼程序的可适用性.....	9
4. 被排除的争端事项.....	10
II. 接触法院的权利	11
1. 接触法院的权利.....	11
(a) 现实且有效的权利.....	12
(b) 限制.....	13
2. 放弃权利.....	15
(a) 原则.....	15
(b) 条件.....	15
3. 法律援助.....	15
(a) 法律援助的授予.....	15
(b) 授予的法律援助的有效性.....	16
III. 制度要求.....	16
1. “审判机构”的概念.....	16
(a) 自治概念.....	16
(b) 管辖权级别.....	17
(c) 具有完全管辖权的法院的审查.....	18
(d) 判决的执行.....	20
2. 由法律所确立.....	22
3. 独立和公正.....	22
(a) 一般性考虑因素.....	22
(b) 独立的法庭.....	23
(c) 公正的法庭.....	24
IV. 程序要求.....	28
1. 公平.....	28
(a) 一般性原则.....	28
(b) 范围.....	29
(c) 第四审诉求.....	33
(d) 对抗性程序.....	35
(e) 平等武装.....	36
(f) 证据审查.....	37
(g) 司法决定的论证.....	39
2. 公开审讯.....	40
(a) 审讯.....	40
(b) 判决.....	42
3. 诉讼期间.....	43
(a) 诉讼期间的确定.....	43
(b) 对合理时间要求的评定.....	44
相关判决和裁定列表	48

介绍

第六条第一款 – 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裁判机构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或者是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利益的话，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1. 本报告旨在为法律工作者们提供与欧洲人权法院成立至今所发布的最为重要的判决中所涉及的重要主题相关的信息¹。因此，本报告展现了由本院判例法以及相关的先例所发展出的诸多重要原则²。本报告中所援引的判例是经过选择的：他们都是最为典型、重要、新近的判决和裁定。

2. 本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在事实上并不仅作用于本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而是在更宽泛意义上用于阐明、保障和发展欧洲人权公约中所设立的规则，从而让缔约国得以更好地遵守(*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 154)。因此，欧洲人权公约体系的使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对公共政策层面的事项作出决定，从而提高人权保护的整体水平并在整个公约缔约国集团内扩展人权的司法保障体系 (*Konstantin Markin v. Russia* [GC], § 89)。

¹ 判例法参考已更新至 2013 年 5 月 1 日。

² 文中所引判决和决定的超级链接连接到该文件的原始英文或法文文本（本法院的两种官方语言）。读者可访问本法院的 [HUDOC](#) 判例法数据库来获取这些判决和决定的英文或法文文本，以及其他语种的译本。

I. 适用范围：“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概念³

第六条第一款：

“在确定其公民权利和义务时，……任何人都拥有由审判机构进行公正的审判……。”

1. 公约第6条第1款的一般适用条件

3. “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不能单独依被申诉国国内法来进行解释；它是公约引申出来的“自治概念”。公约第6条第1款的适用不受案件双方的状态、争议事项相关立法的特点、对争议事项有管辖权的有权机关的特点所制约(参见 *Georgiadis v. Greece* 案, § 34)。“在确定其公民权利和义务时，……任何人都拥有由审判庭进行公正的审判……。”

4. 然而，公约自治概念必须根据现今情势解释的原则，该原则并未赋予法院不考虑“公民(civil)”这一形容词来解释公约第6条第1款的权力，因为“公民”该词限定了本条中“权利和义务”的属性，尽管其并未出现在文本之中(*Ferrazzini v. Italy* [GC], § 30)。

5. 公约第6条第1款在公民事项中的适用首先取决于某争议的存在。其次，该争议必须与至少可被相关国内法承认的“权利和义务”有关。最后，这些“权利和义务”必须在公约下被认定为具有“公民”(civil)属性，尽管第6条未给这些“权利和义务”在缔约国法律体系内规定任何特定内容(*James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 81)。

(a) “争端(DISPUTE)”的概念

6. “争端”一词(法文“*contestation*”)必须被赋予实际意思而不仅是形式上的(*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45)。透过语言的表面解读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每个案件的不同事实上是十分必要的(*Gorou v. Greece (no. 2)* [GC], § 29; 以及 *Boulois v. Luxembourg* [GC], § 92)。第6条并不适用于没有争议的和单边的程序，这些程序没有对立的当事人，且只有当事人对权利没有争议时才可使用(*Alaverdyan v. Armenia*, (裁定), § 35)。

7. 该“争端”必须真实且程度严重 (*Sporrong and Lönnroth v. Sweden*, § 81)。这就可以排除，比如仅因监狱中有 HIV 感染者便向监狱管理机关提出民事诉讼的情形(*Skorobogatykh v. Russia* (裁定))。例如，欧洲人权法院将一涉及向检察官基于法律层面问题提出的上诉请求认定为真实的“争端”，因为其构成了该申诉人以公民一方的身份参加诉讼以意图获得赔偿的整个诉讼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Gorou v. Greece (no. 2)* [GC], § 35)。

8. 此处的争端不仅关系着某权利的实际存在，而且与该权利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也有关(*Bentham v. the Netherlands*, § 32)。该争端还可能与事实问题有关。

9. 诉讼结果必须与所争议问题直接相关 (例如, *Ulyanov v. Ukraine* (裁定))。也就是说，一个模糊的联系或较远的结果不足以提起公约第6条第1款的适用(*Boulois v. Luxembourg* [GC], § 90)。例如，法院认为对续展某核电站执业执照决定合法性提起的诉讼不符合公约第6条第1款的范围，因为其续展执照决定与保护生命，身体完整和财产的权利间的联系过于“模糊和遥远”，申诉人未能证明他们本身已处于具体且迫近的危险中(*Balmer-Schafroth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 40; *Athanassoglou and Others*

³ 本部分是在本法院《受理标准实践指南》的相关部分基础上的修订和更新。

v. Switzerland [GC], §§ 46-55); 参见最近的, *Sdruzeni Jihoceske Matky v. the Czech Republic* (裁定); 涉及工厂有限的噪音污染的案件, 参见 *Zapletal v. the Czech Republic* (裁定); 或者假想的煤矿废物处理对植物的环境影响, 参见 *Ivan Atanasov v. Bulgaria*, §§ 90-95。类似地, 两名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另一名同事被任命到某职位而提出的申诉与他们实际公民权利的关系过于遥远（具体地说, 是他们自己被任命的权利, 参见 *Revel and Mora v. France* (裁定)）。

10. 相反地, 涉及修建大坝会导致申诉人的村庄水灾的案件(*Gorraiz Lizarraga and Others v. Spain*, § 46) 和涉及在申诉人村庄附近使用氰化浸出法开采金矿的许可决定的案件(*Taşkın and Others v. Turkey*, § 133; 同时参见 *Zander v. Sweden*, §§ 24-25)。较近的案件有, 一当地环境保护协会上诉要求复审某计划的许可决定,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该争端与该协会主张的权利间存在充分的联系, 尤其是考虑到该协会的地位和其创始人, 及其在空间和物质上有限的目标(*L'Erablière A.S.B.L. v. Belgium*, §§ 28-30)。进一步而言, 针对个人法律能力恢复的诉讼程序对于他或她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的 (*Stanev v. Bulgaria* [GC], § 233)。

(b) 国内法中存在争议涉及的权利

11. 申请人必须能够声明享有一项由本国法所承认的权利 (*Masson and Van Zon v. the Netherlands*, § 48; *Gutfreund v. France*, § 41; 和 *Boulois v. Luxembourg* [GC], §§ 90-94)。公约第六条本身并未对缔约国本国法中的权利赋予任何具体内容, 且原则上本法院必须参考国内法才可判定权利是否存在。缔约国权力机关在决定是否授予特定申请人所申请的方法时是否享有自由裁量权也可以作为考量因素, 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如此, 仅仅某法律规范文本中提到此种裁量权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某项权利的存在。本院还可以考虑的其他标准包括, 本国法院在类似情况承认了该项权利的存在, 或者本国法院审查了申请者请求的实质内容等。 (*Boulois v. Luxembourg* [GC], §§ 91-101)。

12. 法院可以判定诸如生命权、健康权、环境权和财产权等权利是受国内法所承认的(*Athanassoglou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GC], § 44)。

13. 所争议的权利必须在国内法中具有法律基础 (*Szücs v. Austria*, § 33)。

14. 然而个人能否具有可诉的国内诉求, 不仅可以基于被国内法所承认的相关公民权利, 而且还可基于其向国内法院起诉的可能性、在程序上遭受阻碍或限制的事实存在。对于程序上障碍的情形可适用公约第6条第1款的, 参见(*Al-Ads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47; *McElhinney v. Ireland* [GC], § 25)。尽管原则上公约第6条不能适用于对国内法已有权利的实体限制(*Roche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19)。公约机构不得通过解释第六条第一款来创造一项在本国法上没有法律基础的民事实体权利(《*同上*》, § 117)。

15. 在确定是否存在有一公民权利和对某权利的限制是实体性还是程序性之时, 必须首先考虑相关国内法的条文及国内法院对该条文的解释(*Masson and Van Zon v. the Netherlands*, § 49)。对条文的解读不能停留于表面, 而需要深入研究国内法是如何对特定限制进行分类的, 且要注意与现实结合 (*Van Droogenbroeck v. Belgium*, § 38)。最后要明确的是, 终决法院的裁决并不绝对地剥夺申诉人诉求的可争议性(*Le Calvez v. France*, § 56)。例如对由外国政策引导下的行为（北约空袭塞尔维亚）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是有限的, 但这并不会使申诉人的申诉丧失可争议性, 因为这其实是国内法院第一次被要求审理相关事项(*Markovic and Others v. Italy* [GC], §§ 100-02)。

16. 对于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的限制适用上述标准是不同的，欧洲人权法院确认了对警方失职提出的民事诉讼（参见 *Osman v. the United Kingdom*）或对当地政府机关的民事诉讼（参见 *Z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适用公约第6条第1款，并且考虑到了特定的限制（诉讼豁免或免除责任）是否符合公约第6条第1款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法院承认官方对军方人员从实体限制方面衍生出的豁免，且其国内法不承认该种豁免为公约第6条第1款下的“权利”（*Roche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24; 同时参见 *Hotter v. Austria* (裁定), and *Andronikashvili v. Georgia* (裁定)）。

17.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协会、组织等也可以成为公约第6条第1款的适格主体，如果是为了其成员的特定权利和利益得以认可（*Gorraiz Lizarraga and Others v. Spain*, § 45），或者甚至是为了基于其法人身份而享有的特定权利（如公众知情权和参与环境决策权 – 参见 *Collectif national d'information et d'opposition à l'usine Melox – Collectif Stop Melox et Mox v. France* (裁定) 裁定), 或者当该协会的诉讼未能被看作为公益之诉（*actio popularis*）（参见 *L'Erablière A.S.B.L. v. Belgium*）。

18. 当立法对从事相关职业或专业人士设定了特别条件时，个人必须满足该条件才能被准许从事相应职业或专业（*De Moor v. Belgium*, § 43）。例如，申诉人在其诉求中认为其已经符合法律对医生职业注册的要求，则此时公约第6条便可适用（*Chevrol v. France*, § 55; 反例可见于 *Bouilloc v. France* (裁定)）。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涉及某公民权利的诉讼之合法性因申诉人已使用了相关的司法救济而遭到质疑，则可以得出存在有“公民权利”的“争议”，也许尽管最终发现申诉人并不满足法律上的要求（申诉人要求继续其在外国从事的医药职业的权利，参见 *Kök v. Turkey*, § 37）。

(c) 权利的“公民”本质

19. 某权利是否在公约下被视为具有公民本质，必须根据所涉缔约国国内法规定的该权利的实体内容和效果 – 而不是该权利的法律分类。为了行使法院的监督权，法院同时应考虑到公约的目标和宗旨与其他缔约国的国内法律体系（*König v. Germany*, § 89）。

20. 原则上，对国内法上所认为的私人主体间的公民争端在欧洲人权法院提起时是默认可适用公约第6条第1款的（有关一个司法分离的案件，参见 *Airey v. Ireland*, § 21）。

(d) 权利的私人属性：从金钱的视角

21. 法院认为在国内法上属于“公法”范围且其结果对私人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有决定性影响的诉讼是符合公约第6条第1款的范围要求的。相关的诉讼可见于出卖土地的许可（参见 *Ringeisen v. Austria*, § 94），开办私人诊所（参见 *König v. Germany*, §§ 94-95），建筑许可（尤其参见 *Sporrong and Lönnroth v. Sweden*, § 79），宗教建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参见 *Sâmbata Bihor Greco-Catholic Parish v. Romania*, § 65），从业要求的行政许可（*Bentham v. the Netherlands*, § 36），销售酒精饮料的许可（参见 *Tre Traktörer Aktiebolag v. Sweden*, § 43）或涉及与工作相关的疾病或事故的支付或赔偿的争议（*Chaudet v. France*, § 30）。

22. 同样第6条也适用于特定职业机构内部的有关行使职业权利的纪律处罚程序（参见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Philis v. Greece* (No. 2)），对国家提出的失职诉讼（参见 *X. v. France*），因行政决定的撤销危及申诉人的权利而提起的诉讼（参见 *De Geouffre de la Pradelle v. France*），禁止在申诉人的水域捕鱼的行政诉讼（参见 *Alatulkkila and Others v. Finland*, § 49）和就一公民权利提出的赔偿诉讼 – 如在为某公共项目投标时，不因个人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而被歧视的权利（参见

Tinnelly & Sons Ltd and Others and McElduff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 反例可见 *I.T.C. Ltd v. Malta* (裁定))。裁定

23. 公约第 6 条第 1 款对刑事程序的公民一方的民事诉求也适用（参见 *Perez v. France* [GC], §§ 70-71），除非该民事诉讼仅是为了达到个人报复或惩罚的目的（参见 *Sigalas v. Greece* , § 29; *Mihova v. Italy* (裁定)）。公约并不包含任何可使第三方被指控或获罪的权利。符合公约范围的权利必须与受害人在国内法上提出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不可分离，即使该权利只是为了保护标志性意义的修复，或保护诸如“良好名誉”之类的公民权利（参见 *Perez v. France* [GC], § 70; 同时参见，关于象征性奖励的, *Gorou v. Greece (no. 2)* [GC], § 24)。因此自申诉人成为公民一方开始，公约第 6 条可以适用其所涉诉讼，除非申诉人清楚明白地放弃其修复权利。

裁定24. 公约第6条第1款还可以适用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合理对待而寻求赔偿的民事诉讼（参见 *Aksoy v. Turkey*, § 92）。

2. 对其他争端形式的延伸适用

25. 欧洲人权法院主张公约第6条第1款适用于社会事项，包括有关雇员被私人公司解雇的诉讼（参见 *Buchholz v. Germany*），发放社会保险福利的诉讼（参见 *Feldbrugge v. the Netherlands*）或关于福利援助金的诉讼，即便属于不必摊付公积金的情况（参见 *Salesi v. Italy*），还包括有关强制社会保障缴款的诉讼（参见 *Schouten and Meldrum v. the Netherlands*）。在上述案件中，法院认为其私法方面较之公法方面占主导。此外法院还认为获得福利津贴和获得因纳粹迫害而在私法上给予的赔偿金有一定相似之（参见 *Woś v. Poland*, § 76）。裁定

26. 公职人员提起的争端在原则上属于公约第 6 条第 1 款的范围。在 *Pellegrin* 案的判决中（参见 *Pellegrin v. France* [GC], §§ 64-71），法院采用了一种“功能性”标准。法院在 *Eskelinen* 判决中决定使用一种新的方法（参见 *Vilho Eskelinen and Others v. Finland*[GC], §§ 50-62）。该原则首先推定公约第 6 条适用，然后需要由被申诉国政府来证明，第一，提起民事诉讼的公职人员在国内法上不享有获得法院救济权；第二，排除公职人员依据公约第 6 条该享有的此种权利是合法的。若申诉人在国内法院享有了救济权，则公约第 6 条可以适用（甚至适用于现役部队军官及其向军事法院提出的诉求，参见 *Pridatchenko and Others v. Russia*, § 47）。考虑到上述第二条标准，对公职人员权利的排除需要在“以国家利益的客观基础”上加以合法性阐释，从而要求国家去证明该争议的主体事由与国家权力的行使有关或者会动摇国家与其公职人员的特殊联系。因此在原则上对于普通劳动争议案件，如有关薪水、津贴或类似补贴，排除第 6 条权利的适用上是没有正当性理由的，这是考虑到特定公职人员与国家间的特殊关系（例如有关警察人员特殊津贴的争议，参见 *Vilho Eskelinen and Others v. Finland* [GC]）。最近的 *Eskelinen* 判决确立了新的标准，法院宣布公约第 6 条第 1 款适用于有关不公平地开除使馆工作人员（波兰使馆的秘书兼接线员的诉讼，参见 *Cudak v. Lithuania*[GC], §§ 44-47), 一个高级警察官员 (*Šikić v. Croatia*, §§ 18-20) 或者一个军事法庭中的军事官员 (*Vasilchenko v. Russia* (裁定), §§ 34-36), 还适用于有关议会助理职位获取的诉讼 (*Savino and Others v. Italy*) 和对一名法官提起的纪律处罚诉讼（参见 *Olujčić v. Croatia*），检察官提起的对于其转任的总统法令的上诉（参见 *Zalli v. Albania* (裁定), 以及其中引用的其他参考资源), 涉及海关官员的职业生生涯的程序（申请获得内部升职的权利: *Fiume v. Italy*, §§ 33-36）。

27. 宪法性争端也可以属于公约第 6 条的范围，前提是该宪法性程序对于普通法院进行的公民权利争端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参见 *Ruiz-Mateos v. Spain*）。这并不适用于涉及作为特例授予个人公民身份的总统法令的纠纷，或者是否总统违反了宪法宣誓的问题，因为这些程序并不涉及公民权利和义务：*Paksas v. Lithuania* [GC], §§ 65-66. 对于宪法法院进行的临时措施，第 6 条第 1 款的适用，参见：*Kübler v. Germany*, §§ 47-48。

28. 最后一点，公约第6条同时也适用于其他非严格意义上的金钱性事项，如环境问题，其争议事项可能会涉及生命权、健康权或环境健康权（参见 *Taşkın and Others v. Turkey*）；收养孩子（参见 *McMichael v. the United Kingdom*）；孩子的上学安排（*Ellès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 21-23）；建立亲子关系的权利（*Alaverdyan v. Armenia*（裁定），§ 33）；自由权（参见 *Laidin v. France (no. 2)*）；囚犯的羁押安排（例如有关囚犯何种限制条件下会被安排到高安全级别的囚房，参见 *Enea v. Italy* [GC], §§ 97-107 或者到高级安全室（*Stegarescu and Bahrin v. Portugal*），或者根据监狱纪律处罚程序的结果从而限制了其家人探视的权利，参见 *Gülmez v. Turkey*, § 30）；良好名誉权（参见 *Helmers v. Sweden*, § 27）；获得行政文件的权利（参见 *Loiseau v. France*（裁定））或者反对他人获取将影响名誉权的警察文档的上诉，获得财产保护的權利以及获得就业因而能够生存的权利（*Pocius v. Lithuania*案，§§ 38-46，以及 *Užukauskas v. Lithuania*, §§ 32-40）；成为社团成员的权利（*Sakellaropoulos v. Greece*（裁定））——同样地，涉及社团的注册的程序关系到社团的民事权利，即使在国内法下结社自由是在公法领域下的问题：*APEH Üldözötteinek Szövetsége and Others v. Hungary*, §§ 34-35）；和继续高等教育的权利（参见 *Emine Araç v. Turkey*, §§ 18-25），在基础教育背景下更为适用的立场（*Oršuš and Others v. Croatia* [GC], § 104）。因此，公约第六条扩展至那些毫无疑问可能非个人私生活产生直接且重要影响的诉讼程序（*Alexandre v. Portugal*, §§ 51 及 54）。

3. 公约第6条对非主体诉讼程序的可适用性

29. 初步程序，比如有关采取临时措施如禁令，通常不被认为可以“决定”公民权利和义务从而一般不属于第6条的保护范围（尤其参见 *Verlagsgruppe News GmbH v. Austria*（裁定）和 *Libert v. Belgium*（裁定））。然而，欧洲人权法院近来背离了其之前的判例法而采纳了一种新的路径。

30. 在 *Micallef v. Malta* 案[GC]（§§ 83-86）中，欧洲人权法院确定了可使临时措施适用公约第 6 条的若干条件。首先，同时存在于主体和临时禁令程序中的争议权利需要在公约的意义下为“公民”的。其次，该临时措施的本质、目标、宗旨及效果应当被仔细审查。只要能有效确定争议中的权利或义务的临时措施，不论其生效时间有多久，都可以适用公约第 6 条。

31. 诉中判决可被视为临时或过渡性手段和程序，因此关于判定第六条在民事案件中是否适用的规则对其也同样适用。（*Mercieca and Others v. Malta*, § 35）。

32. 同样依据 *Micallef v. Malta* [GC]一案中所确立的原则，公约第六条可以在符合以上标准的前提下适用于延缓执行判决程序（*Central Mediterran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v. Malta (no. 2)*, §§ 21-23）。

33. 第6条可以适用于与待进行的主要程序追求同样目的的临时程序，若该临时禁令是立即生效的并对同一权利进行了授予（*RTBF v. Belgium*, §§ 64-65）。

34. 有关连续的刑事和民事诉讼。如果某缔约国国内法规定了诉讼分为两阶段 – 法院在第一阶段确定是否需要给予原告赔偿，而在第二阶段确定赔偿的具体金额 – 这样

在公约第 6 条下看是合理的，因为公民权利只有到准确金额决定后才真正得以确定：确定权利的判决不仅包括该权利的存在与否，其行使范围和方式，当然还包括对赔偿的确定(*Torri v. Italy*, § 19)。

35. 有关法院裁决的执行。公约第6条第1款适用于“确定……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诉讼程序的全部阶段，故也包括实体判决的后续阶段。所以在公约第6条的意义下，判决的执行就自然被看作“审判”程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参见*Hornsby v. Greece*, § 40; *Romańczyk v. France* § 53, 涉及授予赡养费债务的恢复的判决的执行）。不用考虑公约第6条对之前的诉讼程序是否适用，实现确定了公民权利的执行程序不需要之前的诉讼也可适用公约第6条（参见*Buj v. Croatia*, § 19）。对本国承认法的外国法院没收决定的裁定，只有所涉权利为公民权利时，才可以适用公约第6条（参见*Saccoccia v. Austria*（裁定））。裁定

36. 有关欲重启国内诉讼程序的申诉。公约第 6 条不适用于欲重启已在国内得到终决裁决的民事诉讼的申诉程序(*Sablon v. Belgium*, § 86)。该结论同样适用于在欧洲人权法院已作出确定违反公约权利的判决后要求重启国内诉讼的情形(*Verein gegen Tierfabriken Schweiz (VgT) v. Switzerland (no. 2)* § 24)。然而，依然存在非常例外的情形，在国内法律体系下申请重启程序是对于民事诉求唯一的寻求救济的法律手段，因此其结果也就对申诉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决定性的(*Melis v. Greece*, §§ 19-20)。

37. 公约第六条也被声明可适用于对申请人公民权利义务有直接影响的第三方上诉。(*Kakamoukas and Others v. Greece* [GC], § 32)。

4. 被排除的争端事项

38. 仅仅显示某争端的本质是金钱性的并不足以使其适用公约第 6 条第 1 款(*Ferrazzini v. Italy* [GC], § 25)。

39. 涉税事项不属于公约第 6 条的适用范围：涉税事项属于国家公权力的核心内容，纳税人和国家间的关系仍然是以公权力性质为主导(*Ferrazzini v. Italy*, § 29)。类似地，还包括涉及海关关税或费用的简易强制程序(*Emesa Sugar N.V. v. the Netherlands* (裁定))。

40. 上述规则同样适用于移民领域与授予政治庇护或驱逐出境的诉讼相关的外国人入境、居留和驱逐等问题（为推翻某驱逐令提出的申诉：参见：*Maaouia v. France* [GC] § 38; 引渡案件，参见 *Peñañiel Salgado v. Spain* (裁定) 及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 [GC], §§ 81-83; 由未获得政治庇护的寻求庇护者提起的赔偿诉讼，参见 *Panjeheighalehei v. Denmark* (裁定)), 不考虑其中对私人或家庭生活或就业方面的潜在严重影响。这一不可适用性扩展至申根信息系统下对外国人的纳入: (*Dalea v. France* (裁定))。持有护照权和享有国籍权不是公约第 6 条保护的公民权利(*Smirnov v. Russia* (裁定))。然而外国人申请工作许可的权利或可适用公约第 6 条，不论是对该雇员还是其雇主而言，而且即使由于所涉事项仅为程序性限制而非实体权利使得该雇员在国内法上并不拥有适格的诉讼地位，该条也可适用 (*Juriscic and Collegium Mehrerau v. Austria*, §§ 54-62)。

41. 根据*Vilho Eskelinen and Others v. Finland* [GC]，涉及国家公职人员的争端在前述两标准满足时则不适用公约第6条（见本案§ 22）。例如因纪律惩罚的原因被开除的士兵无法向审判庭起诉该决定，因为这涉及该申诉人与国家间的特殊关系（参见*Suküt v. Turkey*（裁定））。裁定为了使此种例外具有正义性，仅仅由国家确立案件所涉公务人员参与了公权力的行使，或者，借用pellegrin法院的用词，在公务人员和作为雇主的国家之间存在特殊的信任和忠诚的结合是不够的。国家还需要表明争议的事项必须

与国家权力的行使相关，或者它对这种“结合”提出了疑问。原则上，基于涉案的特定公务人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第六条对于一般劳动争议，如与薪资、补助或者类似权利相关的争议，的保障上的例外情形并无正当理由（*Vilho Eskelinen and Others v. Finland* [GC], § 62)。

42. 最后，政治权利不能像公民权利一样受到公约第6条第1款的保护。有关参加竞选并保留其席位的权利的（竞选纠纷，参见*Pierre-Bloch v. France*, § 50；有关前议成员获得退休金的权利：参见*Papon v. France*（裁定）；有关某政党进行其政治活动的权利：（关于政党的解散，参见*Refah Partisi (The Welfare Party) and Others v. Turkey*（裁定））。类似地，对议会选举进行观察的某非政府组织因获取内容与己无关的相关文件的要求被拒绝而提出的申诉也不属于公约第6条第1款的范围内（参见*Geraguyun Khorhurd Patgamavorakan Akumb v. Armenia*（裁定））。

43. 同时，法院最近再次确认，对在某个公开法庭中陈述的事项的报告，不是民事权利。（*Mackay and BBC Scot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 20-22）。

44. 结论：当存在以上标准所定义的与“公民权利义务”相关的“争议”时，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赋予相关方向法院或审判庭就其公民权利和义务提出任何诉请的权利。因此，这一条包含了“获得法院审判的权利”，其中又包含了诉权，意即就民事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6）。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对此权利在法院的机构和组成以及程序的操作上都给予了保障。总而言之，这个整体构成了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II. 接触法院的权利

第六条第一款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时，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构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

1. 接触法院的权利

45.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所保障的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必须根据法治理念来解释，这要求诉讼当事人应当享有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来保护其公民权利（*Beles and others v. the Czech Republic*, § 49）。

任何人都享有向法院或审判机构提出与其公民权利和义务相关的主张。因此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包含了“接触法院的权利”，其中又包含了诉权，意即就民事事项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6）。“进入法院”的权利以及向法院申诉的权利并非绝对，而是可能受到诸多约束的，但是这些约束不得限制或减少留给个体在其权利的核心被损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Philis v. Greece*, § 59; *De Geouffre de la Pradelle v. France*, § 28, and *Stanev v. Bulgaria* [GC], § 229）。⁴

⁴ 同时参见“公平”部分

(a) 现实且有效的权利

46. 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必须是“现实且有效”的。(*Bellet v. France*, § 38)为保证诉权是有效的，个人必须拥有清楚、可行的机会来挑战对其权利构成干涉的行为。(*Bellet v. France*, § 36; *Nunes Dias v. Portugal* (裁定))。规范提起上诉或申请复审的正式步骤以及时间限制的规则旨在确保司法公正，特别是要符合法律的确定性原则。(*Cañete de Goñi v. Spain*, § 36)。因此，有争议的规则或其应用不得阻碍当事人寻求有效的救济手段。(*Miragall Escolano v. Spain*; *Zvolsky and Zvolska v. the Czech Republic*, § 51)。

47. 在某些情形下，此项权利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可能受到损害，例如：

- 鉴于个体的经济状况，司法程序的成本过高：
 - 作为民事主体申请加入刑事诉讼程序的保证成本过高 (*Ait-Mouhoub v. France*, §§ 57-58; 同时参考 *Garcia Manibardo v. Spain*, §§ 38-45;
 - 过高的庭审费用 (*Kreuz v. Poland (no. 1)*, §§ 60-67); *Podbielski and PPU PolPure v. Poland*, §§ 65-66; *Weissman and others v. Romania*, § 42; 反例可参见, *Reuther v. Germany* (裁定));
- 与时间限制相关的事项：
 - 上诉聆讯的时间导致该上诉被宣告不予接受 (*Melnyk v. Ukraine*, § 26);
 - 申请人在诉讼程序的后期才被告知他们一直以来善意且勤勉实施的请求已逾时效，他们维护权利的可能性则被永远剥夺了 (*Yagtzilar and Others v. Greece*, § 27);
- 程序上禁令的存在阻止或限制了向法院提出申请的可能性：
 - 本国法院对于程序规则极其严格的解释可能剥夺申请人获得审判的权利 (*Perez de Rada Cavanilles v. Spain*, § 49; *Miragall Escolano v. Spain*, § 38; *Société anonyme Sotiris and Nikos Koutras ATTEE v. Greece*, § 20; *Beles and others v. Czech Republic*, § 50; *RTBF v. Belgium*, §§ 71, 72, 74);
 - 与执行较早的裁决相关的要求可能损害获得审判的权利，例如申请人资金的缺乏导致其根本不可能履行之前的判决 (*Annoni di Gussola and Others v. France*, § 56; 与之相较，可参见 *Arvanitakis v. France* (裁定))。
 - 程序规则禁止特定法律主体进入法院审判程序 (*The Holy Monasteries v. Greece* § 83; *Philis v. Greece*, § 65; 同时参见 *Lupas and others v. Romania (no.1)*, §§ 64-67; 与具有能力缺陷的少数群体相关，可参见: *Stanev v. Bulgaria* [GC], §§ 241-245)⁵。

尽管如此，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看，上诉的受理条件可以依法严于普通上诉的受理条件。考虑到上诉法院角色的特殊性，案件经其受理之后的程序可以更加正式，尤其是当在其受理案件之前本案已经由具有管辖权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审理过的情形下。(*Levages Prestations Services v. France*, §§ 44-48; *Brualla Gomez de la Torre v. Spain*, §§ 34-39)。

48. 进而言之，进入法院的权利不仅包括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还包括获得法院对此争议的判决的权利 (*Kutic v. Croatia*, § 25 and § 32 涉及诉讼程序的停滞; *Acimovic v. Croatia*, § 41; *Beneficio Cappella Paolini v. San Marino*, § 29 涉及违背司法公正)。若法院未按照法定的时间期限审理以一系列仅存在于有限期间内的决定为对象的上诉时，

⁵. 同时参见“法律援助”部分

该接触法院的权利也可能被侵害(*Musumeci v. Italy*, §§ 41-43) or in the absence of a decision (*Ganci v. Italy*, § 31)。“接触法院的权利”也包括判决的执行⁶。

(b) 限制

49. 接触法院的权利并非绝对，而是受到诸多暗含的限制 (*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Stanev v. Bulgaria* [GC], §§ 230)。这尤其适用于关乎上诉申请的受理条件的情形，因为本质上其要求享有一定裁量权的国家来予以规范。(*Luordo v. Italy*, § 85)

50. Nonetheless, the limitations applied must not restrict or reduce the access left to the individual in such a way or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right is impaired. Furthermore, a limitation will not be compatible with Article 6 § 1 if it does not pursue a “legitimate aim” and if there is not a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of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the means employed and the aim sought to be achieved”尽管如此，这些约束的适用不得限制或减少个人在权利被侵犯时所享有的接触权。进一步而言，一项约束若不具备合法的目的或者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没有合理适当的联系，则其便不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要求 (*Ashingdane v. the United Kingdom*, § 57; *Fayed v. the United Kingdom*, § 65; *Markovic and Others v. Italy* [GC], § 99)。

51. 接触法院的权利在特定情形下也可能受到一系列合法限制的约束，例如法定的时效 (*Stubbings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51-52), 诉讼费用担保令 (*Tolstoy Miloslavsky v. the United Kingdom*, §§ 62-67) 或者法律陈述的要件。(*R.P.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3-67)

52. 解除法院的权利在法律上或实践中被限制的，本法院审查该限制是否影响到权利的实质，具体而言，该限制是否具备合法的目的或者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合理适当的联系: *Ashingdane v. the United Kingdom*, § 57. 若该限制与本法院所确立的原则相符，则并不存在违反第六条第一款的情形。

53. 国际组织对国内司法管辖的豁免: this treaty-based rule – which pursues a legitimate aim 这一以条约为基础的规则——旨在追求合法目的—— (*Waite and Kennedy v. Germany* [GC], § 63) 只要其衍生的限制是相称的，则其实被第六条第一款所允许的。因此，若相关当事人拥有合理的替代性手段来有效保护其公约权利，则这种豁免是与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相符的(*Waite and Kennedy v. Germany* [GC], §§ 68-74; *Prince Hans-Adam II of Liechtenstein v. Germany* [GC] § 48; *Chapman v. Belgium* (裁定), §§ 51-56)。

54. 国家豁免: 国家豁免理论被各国广泛接受。成员国所采取的支持国际公法上国家豁免的措施并不必然构成对接触法院权的不适当限制。(*Fogart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6; *McElhinney v. Ireland* [GC], § 37; *Sabeh El Leil v. France* [GC], § 49)

- State immunity from jurisdiction 国家管辖豁免: 在国家司法管辖豁免原则的适用限制了接触法院权实现的案件中，必须确定案件的情形是否能证明该限制的正当性。该限制必须具有合法目的且与该目的相称(*Cudak v. Lithuania* [GC], § 59; *Sabeh El Leil v. France* [GC], §§ 51-54)在民事诉讼中授予国家主权豁免追求的是符合国际法规定、旨在促进睦邻友好关系的合法目的。(*Fogart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4, and *Al-Ads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54; *Treska v. Albania and Italy*, (裁定)) 关于采取的措施是否合适，其在部分案件中损害了个人接触法院权的核心。(*Cudak v. Lithuania* [GC], § 74; *Sabeh El Leil v. France* [GC], § 49) 但在其他案件中却并不构成损害 (*Al-Ads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⁶. 同时参见“执行”部分。

[GC], § 67; *Fogart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9; *McElhinney v. Ireland* [GC], § 38)。

国家司法管辖豁免收到国际习惯法的发展限制：例如，除仅有的几种情形外，豁免规则对国家与其在国外执行外交使命的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并不适用（。*Sabeh El Leil v. France* [GC], §§ 53-54 and §§ 57-58)对豁免的限制手段也可能被施加于国家和外国私主体之间的商务交易之间。（*Oleynikov v. Russia*, §§ 61 and 66）。另一方面，本法院注意到在2001年，对于在法院所在国实施的行为或疏忽造成个人伤害的情形，尽管在国际法和比较法上呈现出对国家豁免予以限制的趋势，但这种实践却并非一般性的。（*McElhinney v. Ireland* [GC], § 38）

- 国家执行豁免本身并不构成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背。本法院注意到在2005年所有管理国家豁免的国际法律机构都设立了一项一般性原则，即除了严格界定的特定例外之外，外国享有在法院所在国的执行豁免权。（*Manoilescu and Dobrescu v. Romania and Russia* (裁定), § 73)通过例证，本法院在2002年认为尽管希腊法庭决定德国政府向申请者予以赔偿，这并不必然要求希腊政府确保申请者能够通过希腊的执行程序得到补偿。（*Kalogeropoulou and Others v. Greece and Germany* (裁定)) 这些决定对当时国际法的缔约国有效，但并不预先排除法律中未来的变化。

55. 议员免责权: 为了保障人民代表的自由发言并且防止党派争论干涉议会的运作，国家授予议会成员不同程度的豁免权已成为一项长期的实践。（*C.G.I.L. and Cofferati (no. 2) v. Italy*, § 44)因此，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议员豁免权是与公约第六条相符的：

- 最求合法目的：保护议会中的言论自由，维护立法和司法权力的相互独立（*A. v. the United Kingdom*, §§ 75-77 and § 79);
- 与力图实现的目的相称（如果相关当事人有合理的替代性手段来有效保护其权利）（*A. v. the United Kingdom*, § 86)且该豁免权仅限于议会职能的行使。（*A. v. the United Kingdom*, § 84; *Zollmann v. the United Kingdom* (裁定))若欠缺与议会行为的明确联系，则要求对手段与目的之间“相称性”进行限制解释。（*Cordova v. Italy (no. 2)*, § 64; *Syngelidis v. Greece*, § 44)无论议会成员何时做出抨击性言论，个人的接触法院权不得用与第六条第一款不符的手段予以限制。（*Cordova v. Italy (no. 1)*, § 63; *C.G.I.L. and Cofferati (no. 2) v. Italy*, §§ 46-50, 此案中受害者无任何保护其权利的替代性方法。

56. 法官的司法管辖免除 同样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精神，前提是其需追求合法的目的，即正当行使司法权（*Ernst and Others v. Belgium*, § 50),且遵守比例原则—申请者有合理的替代性手段来有效保护其公约下的权利（*Ernst and Others v. Belgium*, § 53-55）。

57. 公务员豁免权: 对个人所享有的针对公务员的言论和调查结果提起损害公务员声誉的法律诉讼的能力所施加的限制可能是追求基于公共利益的合法目的（*Fayed v. the United Kingdom*, § 70); 尽管如此，在所采取的手段和合法目的之间必须有相称的联系（*Fayed v. the United Kingdom*, §§ 75-82）。

58. 豁免的限制: 如果一个不受公约执行机构制约或控制的国家能够将整个民事申诉都从法院的管辖中剥离或者将豁免权授予大规模或多类别的人群，则这便不符合民主社会中的法治原则或第六条第一款的基本原则--即民事申诉必须能够被提交给法官予以裁判（*Fayed v. the United Kingdom*, § 65; *McElhinney v. Ireland* [GC], §§ 23-26; *Sabeh El Leil v. France* [GC], § 50）。

2. 放弃权利

(a) 原则

59. 在缔约国国内法律制度中，个人对其案件被法院或审判机构审理的权利的放弃在民事案件中经常发生，特别是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形式。放弃权利，无疑对相关个人以及司法都具有好处，在原则上并不与公约相违背。(*Deweert v. Belgium*, § 49)

(b) 条件

60. 当事人可以赞成仲裁而放弃接触法院的权利，前提是这种放弃被规则允许，并是在自由状态下被明确做出的。(*Suda v. the Czech Republic*, §§ 48-49)。在民主社会中，接触法院权十分重要，不能仅由于个人作为参与者在除法庭程序之外的辅助性程序中形成了解决方法便放弃接触法院权带来的利益(参考前案)⁷。

3. 法律援助

(a) 法律援助的授予

61. 第六条第一款并未暗示政府必须对所有与“公民权利”相关的争议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Airey v. Ireland*, § 26)。旨在保障特定情形下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的第六条第三款 C 项和并未提及法律援助的第六条第一款之间有明显的区别(*Essaadi v. France*, § 30)。

62. 尽管如此，公约仍试图保障现实有效的权利，特别是接触法院的权利。因此，第六条第一款有时仍可督促政府提供律师的援助，前提是这种援助被证明是对有效的接触法院权必不可少的(*Airey v. Ireland*, § 26)。

63. 公约第六条是否要求诉讼当事人必须有法律代表这一问题应依据案件特定情形来判断(*Airey v. Ireland*, § 26; *McVicar v. the United Kingdom*, § 48; *Stee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在所有清醒中都必须被确认的是，法律援助的缺乏是否剥夺了申请人被公正审理的权利(*McVicar v. the United Kingdom*, § 51)。

64. 第六条是否暗含提供法律援助的要求取决于：

- 申请者面临危害的权利的重要性(*Stee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
- 相关法律或程序的复杂性(*Airey v. Ireland*, § 24);
- 申请者有效代表其自身的能力(*McVicar v. the United Kingdom*, §§ 48-62; *Stee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1; *P., C. and S. v. the United Kingdom*, § 100);
- 法律规定必须有法律代表的(*Airey v. Ireland*, § 26; *Gnahoré v. France*, § 41 *in fine*)

65. 但是，这项权利并非绝对，因此，除了前文所列举的情形，允许基于以下考虑对法律援助的授予规定约束性条件：

- 诉讼当事人的经济状况(*Stee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2);
- 其胜诉可能性(*Stee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62)。

⁷. 同时参见“公开审讯”部分。

因此，可以存在一个筛选符合条件的案件的法律援助系统 (*Gnahoré v. France*, § 41; *Essaadi v. France*, § 36; *Del Sol v. France*, § 26; *Bakan v. Turkey*, *Aerts v. Belgium*)。因此，对一国内的法律援助机制的质量予以必要的考量 (*Essaadi v. France*, § 35) 并核实国家机关所选择的方法是否与公约相符是很重要的 (*Santambrogio v. Italy*, § 52; *Bakan v. Turkey*, §§ 74-78; *Pedro Ramos v. Switzerland*, §§ 41-45)。

66. 法院给出拒绝法律援助的原因并尽职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是非常重要的 (*Tabor v. Poland*, §§ 45-46; *Saoud v. France*, §§ 133-136)。

67. 不仅如此，拒绝向外国人提供法律援助并不违背第六条的精神 (*Granos Organicos Nacionales S.A. v. Germany*, §§ 48-53)。

(b) 授予的法律援助的有效性

68. 国家对正式任命的律师的行为不负责任。这是法律职业者独立于国家的应有之意 (*Staroszczyk v. Poland*, § 133)，辩护的行为根本上是被告和他的律师之间的事务，无论这个律师是被法律援助机制任命或者是个人雇佣的。这种辩护，除特定情形外，不能导致国家在公约下的责任 (*Tuziński v. Poland* (裁定))。

69 但是，指派律师代表一方当事人本身并不能保证有效的协助 (*Siałkowska v. Poland*, §§ 110 and 116)。被指派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可能在被延长的期限内被禁止履行或逃避其职责。有权机关在被告知此种情形时，必须替换该律师，否则尽管有免费法律援助的规定，诉讼当事人仍会在实践中无法获得有效协助 (*Bertuzzi v. France*, § 30)。

70. 政府有责任保证有效享有接触司法的权利与法律职业独立性之间的必要平衡。本法院已经明确强调过，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拒绝进行援助，则其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若法律援助体系剥夺了个人应当享有的“现实且有效”接触法院的权利，则这些要求便未得到满足 (*Staroszczyk v. Poland*, § 135; *Siałkowska v. Poland*, § 114 - violation)。

III. 制度要求

Article 6 § 1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时，任何人有理由……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构的……审讯。”

1. “审判机构”的概念

(a) 自治概念

71. 从第六条第一款的目的出发，未被纳入国家法院体系的机构也可以被认为是实质意义上的“审判机构” (*Sramek v. Austria*, § 36)。

72. 法院或审判机构是基于其司法功能而言的实质意义上的概念，该司法功能是指，在法治基础上的管辖权内且采取事先规定的程序之后，对事项做出决定 (*Sramek v. Austria*, § 36; *Cyprus v. Turkey* [GC], § 233)。

73. 做决定的权力 是“审判机构”这一概念的固有内涵。根据第六条第一款的要求，诉讼程序必须提供法庭就争议事项所做出的决定 (*Benthem v. the Netherlands*, § 40)。

74. 因此，仅给出具有参考性但无约束力的意见是不够的，即使这些意见被绝大多数案件所遵从 (参考前案)。

75. 从第六条第一款的目的出发，“审判机构”并不必须是相关国家标准司法机制内的法院。它可以被设立用于处理可以在一般的法院系统之外适当管理的特定事项。对确保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重要的是保证，包括适当的实体和程序保证 (*Rolf Gustafson v. Sweden*, § 45)。

76. 因此，“审判机构”可以包含被设立用于决定有限数量特定事项的机构，前提是它必须一直提供适当的保证 (*Lithgow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 201 – in the context of an arbitration tribunal)。

77. 一个机构拥有多种职能(行政，规范，仲裁，建议和纪律等)的事实本身并不将其排除在“审判机构”的范畴之外 (*H. v. Belgium*, § 50)。

78. 做出一项不可被非司法机构朝着不利于独立主体的方向更改的有约束力决定的权力，是“审判机构”的固有内涵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 45)。One of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 rule of law is the principle of legal certainty, which requires, *inter alia*, that where the courts have finally determined an issue their ruling should not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Similarly, in the case of applications for leave to appeal 法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司法稳定，这尤其要求若法院最终对事项作出了决定，则其裁决不应被质疑(这同样适用于上诉申请 (*Brumarescu v. Romania* [GC], § 61)。⁸

79. “审判机构”必须满足一系列进一步的要求– 独立，尤其是执行上；公正；成员有限任职期限；程序所提供的保证；这其中的部分出现在第六条第一款的文本上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5; *Cyprus v. Turkey* [GC], § 233)。事实上，独立和公正是“审判机构”概念的关键组成。⁹

80. 符合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下的“审判机构”概念的机构举例如下：

- 地区性不动产交易机构: *Sramek v. Austria*, § 36;
- 刑事损害赔偿董事会: *Rolf Gustafson v. Sweden*, § 48;
- 森林争端解决委员会: *Argyrou and Others v. Greece*, § 27。

(b) 管辖权级别

81. 尽管第六条第一款并不强制成员国设立上诉或最高法院，但是设立此类法院的国家必须确保对法律负有义务的人必须在法院面前享有第六条第一款包含的基本保证 (*Platakou v. Greece*, § 38):

- 具体性审查: 第六条第一款适用于上诉法院或终审法院的方式取决于相关程序的特定因素。就法律条文所提起的上诉的受理条件可以比普通上诉的要求更严格 (*Levages Prestations Services v. France*, § 45);
- 整体性审查: 本国法律体系中所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整体都必须被纳入考量 (*Levages Prestations Services v. France*, §§ 44-45)。因此，上级或最高法院在某些情形下可以对违反公约规范之一的行为作出赔偿 (*De Haan v. the Netherlands*, § 54)。

⁸. 同时参见本报告“判决执行”部分

⁹. 参见“独立和公正”部分

82. 对灵活性和效率的要求，这与保护人权完全不矛盾，可以使得行政性或职业性机构，更不必说不符合公约第六条要求的司法机构等的事先干涉成为合法。（*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1）。如果这些机构的程序受到后来的具有完全管辖权的司法机构的控制且提供了第六条要求的保障，则并不对公约构成违反（*Zumtobel v. Austria*, §§ 29-32; *Bry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0）。

83. 同理，授予职业的惩戒机构以仲裁职责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会对公约构成侵害。尽管如此，在这些情形下，公约要求至少有以下两种系统之一存在：要么该职业惩戒机构自身符合公约的要求，要么尽管其不符合，但是受到具有完全管辖权的司法机构的事后审查并提供第六条第一款要求的保证（*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 29; *Gautrin and Others v. France*, § 57）。

84. 相应的，本法院反复声明在第六条第一款下，本身并不满足本条要求的行政机构所做出的决定必须受到有完全管辖权的司法机构的事后控制（*Ortenberg v. Austria*, § 31）。¹⁰

(c) 具有完全管辖权的法院的审查

85. 只有具有完全管辖权的机构才可被称作第六条第一款中的“审判机构”（*Beaumartin v. France*, § 38）。第六条第一款要求法院做出有效的司法审查（*Obermeier v. Austria*, § 70）。法院应当行使完全管辖权的原则要求它不得废弃其司法智能中的任何部分（*Chevrol v. France*, § 63）。

86. 所涉及的“审判机构”必须具有完全管辖权来审查与其所受理的争议相关的所有事实和法律问题（*Terra Woningen B.V. v. the Netherlands*, § 52）。

87. 尽管如此，在数种专门法律领域（如城乡规划领域）中法院对于事实方面仅享有有限的管辖权，但若行政机关的决定是基于被推翻或不合理的事实，则法院可以推翻该决定（*Bry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4-47; *Crompton v. the United Kingdom*, §§ 70-73）。

88. 判例法确立了衡量审查是否是由享有完全管辖权的机关在保障公约实施的目的下做出的诸多标准（*Sigma Radio Television Ltd v. Cyprus*, §§151-157）。因此，为了确定司法机构是否做出了足够的审查，下述三项原则必须被统一考虑：

- 上诉申请针对的决定的主要事项：
 - 如果行政决定关乎一项简单的事实问题，相对于关乎需要技术知识的专业领域的决定而言，法院的审查需要更严格；
 - 欧洲现存的体系经常限制法院审查事实问题的权力，但不阻止其在不同层面推翻之前的决定。这在判例法下并不存在问题。
- 决定作出的方式：在行政机关关注之前存在何种程序性保障？
 - 在前置的行政程序中，如果申诉享有诸多符合第六条规定的程序保障，这就使得之后的司法控制可以采取更轻的形式（*Bry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6-47; *Holding and Barnes plc v. the United Kingdom*（裁定））。
- 争议的内容，包括上诉的期望和现实层面（*Bry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5）：
 - 判决必须能够逐点审查申诉者的所有意见，不得拒绝审查其中任何内容，并给出驳回的明确原因。针对事实，法院必须被授权复审申诉案件的核心内容。因此，如果申诉者仅提出程序性意见，其并不得因此批评法院未对事实问题予以审查（*Potocka and Others v. Poland*, § 57）。

¹⁰. 同时参见“公正”部分。

89. 例如，法院拒绝对特定对于解决争议十分重要的事实问题独立作出决定可能构成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反 (*Terra Woningen B.V. v. the Netherlands*, §§ 53–55)。这同样适用于法院不具有对争议的核心问题作出决定的管辖权的情形 (*Tsfayo v. the United Kingdom* § 48)。在此类案件中对案件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项没有受到独立的司法审查。

90. 如果上诉的一个方面得到了支持，审查法院必须有权撤销被质疑的决定，并做出新的决定或将案件发回原机关或其他机关重新做出决定 (*Kings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32, 34)。

91. 若事实已经在满足第六条第一款的诸多要求的准司法程序中被行政机关确立，且对于被行政机关确立的事实或其作出的援引并无争议。同时法院对诉讼当事人上诉的其他方面也逐点进行了审查。则上诉法院所做出的审查的范围就被认为是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Bry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44-47)。

92. 不被认为具有“完全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列举如下：

- 仅有权决定行政机关是否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行使其裁量权的行政法院 (*Obermeier v. Austria*, § 70);
- 审理针对职业协会的纪律机关所做出决定的法律适用部分所提起的上诉，却并无权判断处罚是否与行为相称的法院 (*Diennet v. France*, § 34, 涉及医疗协会, *d Merigaud v. France*, § 69, 涉及勘测员协会);
- 仅有权从合宪性角度调查反驳程序却不能审查所有相关事实的宪法法院 (*Zumtobel v. Austria*, §§ 29-30);
- 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基于其判例法，在案件涉及公约的适用之前处理案件时，有义务遵循部长—同样作为判决执行的代表的—的一个外部机关—的意见，而不必将该意见置于当事方的任何批评和讨论之下 (*Chevrol v. France*, §§ 81-82)。

93. 相反：

- *Chaudet v. France*: 最高行政法院仅做出过一次对申请进行司法审查的决定。在此案中最高行政法院不具有完全管辖权，这本应当造成其决定被民航医疗董事会所替代。但是，从案件材料上可以清楚地发现，最高行政法院在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处理了申请者的所有意见，评估了医疗文件中的所有证据，考虑了各方在庭上对所有医疗报告的讨论结果。本法院因此认为申请者的案件以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要求的方式得到了审查 (§§ 37-38);
- *Zumtobel v. Austria*: 本法院认为奥地利行政法院满足了第六条第一款对不仅限于行政机构裁量权的事项的要求，并且其逐点考量了实体上的意见，同时并未拒绝履行对申请者作出答复或者查明各种事实等管辖智能 (§§ 31-32) – 同时参见 *Ortenberg v. Austria*, §§ 33-34; *Fischer v. Austria*, § 34。
- *McMichael v. the United Kingdom*: 在此案中，治安法庭允许一个儿童被自由收养的命令被上诉到最高民事法院，后者对此享有完全管辖权。最高民事法院一般而言会给予治安法庭发现的事实开展诉讼进程，但这并非必要。其可以在适当情形下自行获取证据，或者将案件发回治安法庭并告知其应当如何如何继续进行 (§66)。进一步而言，治安法庭在审理针对儿童案件的上诉时，也享有完全管辖权，并被授权审查实体和程序上的不合规事项 (§ 82);

- *Potocka and Others v. Poland*: 行政诉讼法决定的最高行政法院的管辖权范围被限制在评定受争议的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尽管如此，如果发现作出决定程序中程序公正的要求未得到满足，该法院也被授权部分或全部废止该项决定。最高行政法院的论证过程表明事实上其审查了该案件便利的方面。尽管该法院能将其分析限制在发现受争议的决定基于申请中的程序和实体错误而必须被支持。该法院已经发布了一项被认真论证过的判决，且申请人有关案件结果的争论已经被全面的处理。因此，最高行政法院的审查范围是与公约第六条第一款相符的 (§§ 56-59)。

(d) 判决的执行

▪ 迅速落实终局性且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决定的权利

94.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保护终局性且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决定的执行（与可能受到上级法院审查的决定的执行相区别）(*Ouzounis and Others v. Greece*, § 21)。

95. 判决被执行的权力，无论判决出自何种法院，是接触法院权的必要组成部分 (*Hornsby v. Greece*, § 40;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 196)。否则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将无任何作用 (*Burdov v. Russia*, §§ 34 and 37)。

96. 这在行政诉讼中更加重要。通过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申请，诉讼当事人所寻求的不仅是废除受到质疑的决定，而更重要的是消除其影响。

97. 对当事人的有效保护以及对合法性的恢复给行政机关预先假定了服从判决的义务 (*Hornsby v. Greece*, § 41; *Kyrtatos v. Greece*, §§ 31-32)。

98. 因此，尽管在特定情形下判决的延迟执行也具有正当性，这种延迟不得损害诉讼当事人要求判决被强制执行的权利 (*Burdov v. Russia*, §§ 35-37)。

99 从这种方式理解，判决必须被完整且圆满地执行 (*Matheus v. France*, § 58; *Sabin Popescu v. Romania*, §§ 68-76)，且不得被阻碍、作废或不正当地延迟 (*Immobiliare Saffi v. Italy* [GC], § 74)。

100. 权力机关拒绝采纳上级法院的决定——潜在导致相同诉讼程序中的一系列判决，即搁置收到的决定——也是与第六条第一款相违背的 (*Turczanik v. Poland*, §§ 49-51)。

101. 对生效判决不合理地长期延迟可构成对公约的违反。延迟执行是否合理需要具体考虑执行程序的复杂性，申请者自身以及相对机关的行为，以及执行内容的数量和特征 (*Raylyan v. Russia*, § 31)。

102. 例如，本法院曾判决国家机关持续五年以上抵触采取必要措施来执行一项最终可执行的司法决定的行为剥夺了第六条第一款的所有作用 (*Hornsby v. Greece*, § 45)。

103. 在另一案件中，在其特定情形下，国家机关耗费总计 9 个月时间去执行一项判决被认为是合理的 (*Moroko v. Russia*, §§ 43-45)。

104. 本法院发现，权力机关在超过四年时间里拒绝使用警察的协助来执行一项针对承租人所有权的命令的行为，以及由于立法机关质疑法院将承租人驱逐的命令而搁置执行达六年时间的行为，完全剥夺了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作用，因此损害了第六条第一款下的接触法院权 (*Lunari v. Italy*, §§ 38-42 (*Immobiliare Saffi v. Italy* [GC], §§ 70 and 74)。

105. 个人在诉讼程序末期得到一项针对国家的判决可不提起单独的执行程序 (*Burdov v. Russia (no. 2)*, § 68)。国家机关自判决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时起 (*Burdov v. Russia (no. 2)*, § 69) 负有确保该判决执行的义务 (*Yavorivskaya v. Russia*, § 25)。

106. 为了同意或加速判决的执行，胜诉方可以被要求采取一定的程序措施。尽管如此，要求债权人进行合作的程度不得超过严格的必要性且不得减轻权利机关的义务 (*Burdov v. Russia (no. 2)*, § 69)。

107. 执行程序之后对申请人的延迟支付不能免除国家机关长期不服从判决的责任，且不能构成足够的救济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 198)。

108. 本法院也认为权力机关不考虑申请者的经济状况，坚持申请者应当承担启动对其有利的生效判决的执行的立场，给申请者造成了过多的负担且限制了其接触法院的权利以至于侵害了该权利的核心 (*Apostol v. Georgia*, § 65)。

109. 诉讼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得被剥夺生效判决所赋予其损害赔偿或房屋中的利益 (*Burdov v. Russia*, § 35), *Teteriny v. Russia*, §§ 41-42), 不管本国判决执行程序的复杂程度或国家财政预算状况如何。国家机关不得以基金或其他资源不足为借口不支付司法债务 (*Burdov v. Russia*, § 35; *Amat-G Ltd and Mebaghishvili v. Georgia*, § 47;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 199)。企业不得以欠缺替代性住房为借口不执行判决 (*Prodan v. Moldova*, § 53)。

110. 国家负债 (*Burdov v. Russia (no. 2)*, §§ 68 and 69 and §§ 72 et seq.) 和个人所负的债必须加以区分：国家的责任不能因“个体“债权人破产而导致其被免除 (*Sanglier v. France*, § 39; *Ciprova v. the Czech Republic* (裁定); *Cubănit v. Romania* (裁定))。。尽管如此，国家具有积极义务组织一个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能有效执行处理私主体之间争议的最终决定的系统 (*Fuklev v. Ukraine*, § 84)。如果执行程序中包含的公共机关未尽到必要职责或阻碍执行，则国家的责任可以因此得到免除 (*Fuklev v. Ukraine*, § 67)。鉴于其在执行中的责任，由于国家机关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因此其用以确保判决执行的方式必须足够实现其目的 (*Ruianu v. Romania*, § 66) (同上案, §§ 72-73)。

111. 因此，比如，本法院认定国家机关拒绝对未有效配合判决执行的第三方（个人）主体施加惩罚的行为剥夺了第六条第一款的所有效用 (*Pini and Others v. Romania*, §§ 186-188; 在此案中，两个小孩生活的私人机构阻碍关于小孩收养的命令的执行超过三年时间)。

112. 尽管如此，国家已经采取所有法律规定的的步骤来确保个人主体服从一项决定的，其不应对债权人拒绝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Fociac v. Romania*, §§ 74 and 78)。

113. 最后，接触法院的权利同样保障进入执行程序的权利，即启动执行程序的权利 (*Apostol v. Georgia*, § 56)。

· 使最终司法决定不受异议的权利

114. 进一步而言，获得公正审理的权利必须在法治体系下予以解释。法治最基本的方面之一是司法稳定原则, (*Okay and others v. Turkey*, § 73), 这尤其要求法院就事项作出最终决定后，其决定不应再受到异议 (*Brumarescu v. Romania* [GC], § 61; *Agrokompleks v. Ukraine*, § 148)。

115. 若司法系统中，最终判决要受到不明确的审查且具有被反复废止的危险，则此系统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Sovtransavto Holding v. Ukraine*, §§ 74, 77 and 82: 此案涉及反对程序，最高仲裁庭的主席，检察长及其副手享有在审判监督程序中通过提起反对来挑战终审判决的裁量权力)。

116. 通过这种方法对决定提出异议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是由法官或执行机构的成员 (*Tregubenko v. Ukraine*, § 36) 或由非司法机关所提起 (*Agrokompleks v. Ukraine*, § 150-151)。

117. 除非具有诸如司法错误等实质性且十分重要的情形，最终判决不得被提起异议 (*Ryabykh v. Russia*, § 52)。

2. 由法律所确立

118. 在法治原则下，公约体系所固有的，本法院认为“审判机构”必须是由法律确立的，否则其审理个人案件时便缺乏民主社会中所要求的合法性 (*Lavents v. Latvia*, § 81)。

119. “由法律确立”不仅指“法庭”存在具有法律基础，也指法庭必须符合对其加以规范的规则 (*Sokurenko and Strygun v. Ukraine*, § 24)。法院或法庭的合法性必须包括其组成部分 (*Buscarini v. San Marino* (裁定))。法官合法任期到期后默示延长其任期且搁置其重新任命的实践被认为是与“法庭由法律确立”原则相违背 (*Oleksandr Volkov v. Ukraine*, § 151)。规范法官任命的程序不能被降为内部操作(参考前案, §§ 154-156)。

120. 第六条第一款中的“法律”不仅包含设立司法机构并赋予管辖权的法规，也包含其他在其被违反后会导致一个或多个法官对不合法事项进行审查的本国规范 (*DMD Group, A.S. v. Slovakia*, § 59)。这具体包括有关法庭成员独立，任职期限，公正，程序保障的规定 (*Gurov v. Moldova*, § 36)。

121. 原则上，法院违反本国法律规范的行为构成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背 (*DMD Group, A.S. v. Slovakia*, § 61)。本法院可因此审查本国法律是否被遵守。尽管如此，考虑到原则上首先是由本国法院自身来解释本国法，本法院认为除非有明显违法行为的存在，不得质疑国内法院对法律的解释 (*DMD Group, A.S. v. Slovakia*, § 61)。在诉讼程序中，无正当理由故意非法逾越其司法管辖权范围的法院不是“由法律设立的法庭”。(*Sokurenko and Strygun v. Ukraine*, §§ 27-28)

122.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由法律设立”的目的是确保司法体系的组成不依赖于执行机关的自由裁量，而是由议会发布的法律所规范的 (*Savino and Others v. Italy*, § 94)。

123. 在法典主义的国家，司法体系的组成也不得由司法机关自由裁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本国法院不享有解释相关本国法律的自由 (*Savino and Others v. Italy*, § 94)。

124. 进一步而言，在关于司法体系组成的事项中进行授权是被允许的，前提是这种可能性在本国法中，包括宪法中的有关规定中，被神圣记载。(参见前案)。

3. 独立和公正

(a) 一般性考虑因素

125. 第六条第一款下被公正审判的权利要求案件由“独立且公正的法庭”予以审理。“独立”和“公正”这两者的保证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基于此原因，本法院一般情况下同时考察这两项要求 (*Kley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GC], § 192)。

126. 非专业性法官参与案件并不违反第六条第一款。由法官主导、公务员和利益相关方列席的审判小组并不当然导致偏见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7 以及 58)，让非专业性法官参与判决的形成这本身也并无异议 (*Pabla Ky v. Finland*, § 32)。

127. 判例法中确立的关乎公正的原则对非专业性法官和专业法官平等适用 (*Langborger v. Sweden*, §§ 34-35; *Coo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23)。

128. 原则上，如果判决受到后续的具有完全管辖权的司法机构的控制且通过弥补缺陷而确保了相关的保障，则不得基于做出审判的法庭欠缺独立性或公正性，或者法庭

违反了根本的程序保障而得出其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的决定 (*De Haan v. the Netherlands*, §§ 52-55)。¹¹

129. 本法院一直强调国家确保案件由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独立公正的法庭所审理的责任不仅限于司法机关。该条款为执行机关、立法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规定了尊重并维护法院的判决和决定的义务，无论该机关的级别如何，无论其时都赞同判决和决定 (*Agrokompleks v. Ukraine*, § 136)。

(b) 独立的法庭

130. “独立”是指独立于其他权力机关（执行机关和议会） (*Beaumartin v. France*, § 38) 以及诉讼参与方 (*Sramek v. Austria*, § 42)。

131. 尽管政府的政治机构和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分离”在本法院的判例法中越来越重要，第六条或公约的其他规定均未要求国家服从这一可能限制权力间互动的宪法理论概念 (*Kley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GC], § 193)。事实上，法庭的独立性要求存在程序保障来将司法权与其他权力相分离。

▪ 独立于执行机关

132. 若执行机关在案件尚在审时干涉审判结果的形成，则法官的独立性遭到了破坏 (*Sovtransavto Holding v. Ukraine*, § 80; *Mosteanu and Others v. Romania*, § 42)。

133. 法官由执行机关任命且可能被解职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反 (*Clarke v. the United Kingdom* (裁定))。由执行机关任命法官是被允许的，前提是任命的形成未受到非法的影响或压力 (*Flux v. Moldova (no. 2)*, § 27)。

134. 最高法院的主席由执行机关任命的事实本身并未危害其独立性，前提是一旦被任命，他便不在受到来自执行机关的压力或指示，完全独立地行使其职权 (*Zolotas v. Greece*, § 24)。

135. 同理，行政理事会的法官由地区行政机关任命的事实本身也不能对法官的独立性或公正性构成疑问，前提是前提是一旦被任命，他便不在受到来自执行机关的压力或指示，完全独立地行使其职权 (*Majorana v. Italy*, (裁定))。

▪ 独立于议会

136. 法官由议会任命的事实本身并不会导致法官附属于议会机关，只要他们一旦被任命，其司法职能的履行便不受到压力或指示 (*Sacilor-Lormines v. France*, § 67)。进一步而言，若上诉法院的成员——主要是职业法官——之一也是议会的成员，这本身也不违背使案件被独立且公正的法庭审判的权利 (*Pabla Ky v. Finland*, §§ 31-35)。

▪ 独立于案件参与方

137. 若法庭成员中有人基于其职责和业务的组织而附属于案件当事方，诉讼当事人可对其独立性提出合法的怀疑。这种情形严重影响了在民主社会中对法院的必须的信任 (*Sramek v. Austria*, § 42)。

¹¹. 同时参见“具有完整管辖权的法院的审查”及“公平”两章节。

· 评估独立性的准则

138. 为了确定某机构是否“独立”，本法院认为需要格外关注以下准则 (*Langborger v. Sweden*, § 32; *Kley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GC], § 190):

- 机构成员任命的方式以及任期;
- 抵御外部压力的保障; 和
- 该机构是否表现出独立性。

(i) 机构成员任命的方式

139. 司法部长对裁判组成员的任命和解职的干涉受到了质疑 (*Sramek v. Austria*, § 38; *Brudnicka and Others v. Poland*, § 41; *Clarke v. United Kingdom* (裁定))。

140. 尽管在这种事件中，将案件指派给特定的法官或法院属于国内肌肤黯国家裁量权的范围，但是必须使本法院相信其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具体而言，符合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要求 (*Bochan v. Ukraine*, § 71)。

(ii) 机构成员被任命的期限

141. 本法院并未对作出判决机关的成员任期做出任何具体规定，但是无限的任期必须被认为是对其独立性的威胁。尽管如此，法律中未规定此种不可解职的正式任命并不当然意味欠缺独立性，前提是事实上其是被任命的且具备其他必要的保障 (*Sacilor-Lormines v. France*, § 67; *Luka v. Romania*, § 44)。

(iii) 反抗外部压力的保障

142. 司法独立要求法官个人不受到司法程序内外的不正当影响。内部的司法独立要求其免受其他法官或诸如法院院长或法院部门主任等对法院负有行政责任的人的指导或压迫。欠缺保障法官在司法部门内，尤其是针对其司法长官，独立性的措施可能导致本法院认为申请人关于法院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怀疑是客观正确的 (*Parlov-Tkalčić v. Croatia*, § 86; *Agrokompleks v. Ukraine*, § 137)。

143. 郡法院法官被认为独立于该法院的院长，原因在于法院院长仅履行行政（管理和组织）职能，这些职能与司法职能相分离。司法体系提供了足够的保障用于反对法院院长向法官指派案件的任意妄为 (*Parlov-Tkalčić v. Croatia*, §§ 88-95)。

(iv) 独立性外观

144. 在确定某法院是否符合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独立性标准时，外观也十分重要 (*Sramek v. Austria*, § 42)。对于独立性外观，一方的立场十分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相关方的恐惧是否是客观正当的 (*Sacilor-Lormines v. France*, § 63)。因此，如果本法院认为一个“客观观察者”在案件的情形中也不能看出任何值得怀疑之处，则此案便不涉及关乎独立性的问题 (*Clarke v. United Kingdom* (裁定))。

(c) 公正的法庭

145. 第六条第一款要求其范围内的法庭是公正的。公正性一般表示不存在偏见，或即使存在也能通过不同方法所检验 (*Wettstein v. Switzerland*, § 43; *Micallef v. Malta* [GC],

§ 93)。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内涵式紧密联系的，根据具体情形，可能需要统一审查 (*Sacilor-Lormines v. France* § 62; *Oleksandr Volkov v. Ukraine*, § 107)。

▪ 评估公正性的标准

146. 公正性必须从以下方面进行判断 (*Micallef v. Malta* [GC], §§ 93):

- 主观检查, 即特定法官的个人确信和行为必须被考察, 具体而言, 该法官是否最案件具有任何偏见;
- 同时也要根据客观检查, 意即通过确认法庭本身和其组成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来排除对其公正性的合法质疑。

147. 主观公正和客观公正之间并无绝对的区分, 原因在于法官的行为不仅可能在外观察者看来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排除合法怀疑的保障 (客观检查), 也可能受到其自身确信的影响 (主观检查)。

148. 因此, 在难以举证反驳法官的主观公正性的案件中, 客观公正性的要求提供了更重要的保障 (参见 *Micallef v. Malta* [GC], §§ 95 and 101)。

(i) 主观途径

149. 进行主管检查时, 本法院一致认为除非有相反证据, 应当推定法官是公正的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8, *in fine*; *Micallef v. Malta* [GC], § 94)。关于所需证据的形式, 本法院曾经尝试确认法官是否表现出了敌意 (*Buscemi v. Italy*, §§ 67-68)。法官在参与了在先的民事诉讼之后并未回避处理与之相关民事上诉案件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足以反驳公正性推定所需的证据 (*Golubović v. Croatia*, § 52)。

150. 法庭被假定未收到个人偏见或不公的影响这一原则在本法院的判例法中确立已久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8; *Driza v. Albania*, § 75)。

(ii) 客观途径

151 除了法官的行为, 必须确定是否存在可以质疑法官公正性的确定的事实。当使用于审判机构时, 这意味着, 除了该机构成员的个人行为之外, 确定是否存在足以质疑该机构公正性的确切事实。这意味着在特定案件中, 在确定是否合法原因来怀疑某法官 (*Morel v. France*, §§ 45-50; *Pescador Valero v. Spain*, § 23) 或审判机构 (*Luka v. Romania*, §§ 40) 缺乏公正性时, 个人的立场十分重要但不具有决定性。or a body sitting as a bench 具有决定性的是这种担忧是否被认为客观正义的 (*Wettstein v. Switzerland*, § 44; *Pabla Ky v. Finland*, § 30; *Micallef v. Malta* [GC], § 96)。

152. 客观检查主要涉及法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级别或其他联系, (参见与法官正当角色相关的案件, 例如 *Mežnarić v. Croatia*, § 36; *Wettstein v. Switzerland*, § 47) 若该联系客观上使对法庭公正性的质疑成为正当, 便不符合在客观检查下的公约标准。

153. 因此, 在个人中必须确定该联系在质和量两方面是否足以表明法庭欠缺公正性 (*Micallef v. Malta*, [GC], §§ 97 and 102)。

154. 在这个方面, 甚至外观也可以具有一定重要性, 换句话说, “司法不仅要公正, 还必须让人看到其公正”。面临危险的是法院在民主社会中必须被赋予的信任。因此, 任何公正性受到合法质疑的法官都必须被免职 (*Micallef v. Malta* [GC], § 98)。

155. 为了使法院获得不可或缺的来自公众的信任, 内部组织的问题也必须被考虑。确保公正性的国家程序的存在, 即关于规范法官罢免事项的规定德贵遵, 是一个相关

的因素(参见弹劾法官的特定规范, *Micallef v. Malta* [GC], § 99-100)。这些规定体现了国家立法者对排除对法官或法院的公正性的所有合理怀疑的忧虑, 也构成一种通过消除这些忧虑产生的原因来确保公正性的尝试。除了确保避免事实上的偏见, 他们也被用来消除任何不公正的表现, 以促进民主社会中公众对法院的信任 (*Mežnarić v. Croatia*, § 27)。

▪ 可能缺乏公正性的情形

156. 以下两种情形下可能存在公正性欠缺的问题:

- 首先是职能性质, 例如, 同一个人在司法程序中行使不同职能, 或者与程序中的其他参与人具有上下级或其他联系。
- 第二种情形是个人品质, 源于法官在给定案件中的行为。

▪ 职能性质的情形

(i) 在相同案件中同时履行建议和司法职能

157. 在一个机构中连续行使建议和司法职能, 在特定情形下, 可能从客观角度上引起第六条第一款下的公正性问题 (*Procola v. Luxembourg*, § 45 – violation)。

158. 这个问题在于是否在“同一案件”“同一决定”或“类似事件”中同时形式了司法和建议职能 (*Kley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GC], § 200; *Sacilor-Lormines v. France*, § 74 – 并未违反)。

(ii) 同一案件中同时行使司法职能和超司法职能

159. 衡量申请者的担忧——诸如法官在诉讼中的正当角色——的客观公正性时, 其参与的两个情形之间相隔的时间以及他参与到诉讼程序的程度等因素都可以被考虑 (*McGonn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52-57)。

160. 任何与法律或行政规则的直接牵连, 都可能足以对之后被要求就是否存在允许法律或规定的用词的原因作出判断的个人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参见 *McGonn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 55-58, 本法院认为一个法官直接参与到一向发展计划的采纳构成了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反, 与之相较 *Pabla Ky v. Finland*, § 34 – 并未违反)。

161. 若同一个人在两个并行的诉讼中分别担任法官和对立方代表人, 申请人可以有合理原因怀疑该法官将继续将其视为对立方 (*Wettstein v. Switzerland*, §§ 44-47)。

162. 一名法官曾经在诉讼初期作为申请人对立方律师, 在审理对此提起的宪法争议后, 本院认为存在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反 (*Mežnarić v. Croatia*, § 36)。关于曾在民事诉讼之初担任申请人对立方的法律顾问的宪法法院法官的公正性, 参见 *Švarc and Kavnik v. Slovenia*, § 44。

(iii) 履行不同司法职能

163. 衡量同一法官参与民事案件的不同阶段是否符合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正性要求, 应当逐案分别处理, 且要考虑不同案件自身的情况。

164. 法官已经做出诉前决定这一事实本身不足以被认定为对公正性的正当怀疑。重要的是该法官在诉前所采取措施的性质和范围。同理, 法官对案件材料有详细了解也并不表明其在做出决定时存在偏见。对可知信息的前期分析也不表明最终的分析是偏颇的。重要的是, 判决发布时要同时公布其分析, 且该分析的做出是基于在审理过程中被采纳的证据和意见 (*Morel v. France*, § 45)。

165. 有必要考虑诉讼不同阶段所确定的实体事项是否足以对参与这些阶段的法官的公正性构成质疑 (*Toziczka v. Poland*, § 36)。

例如:

- 保持公正的义务并未在原则上要求，废除行政或司法决议的最高法院必须将案件发回不同的司法机关或发回该机关的不同组成部门 (*Ringeisen v. Austria, in fine* § 97);
- 如果法官参与两个与相同事实相关的诉讼，则可能导致对公正性的疑问 (*Indra v. Slovakia*, §§ 51-53);
- 由两名业余法官协助的上诉法庭的主审法官不应审理关于他之前决定的上诉 (*De Haan v. the Netherlands*, § 51);
- 上诉法院的法官被要求对在之前做出的决定中是否在法律解释或适用上错误进行判断，可能引起对公正性的质疑 (*San Leonard Band Club v. Malta*, § 64);
- 同一法官参与了关于一个案件实体内容的决定，又参与了审查就其该决定所提起的上诉申请的审查，这并非与公正性要求明确不符 (*Warsicka v. Poland*, §§ 38-47);
- 拥有双重身份的法官，在前一个诉讼中担任申请人对立方的律师，在后一诉讼中担任上诉法院的法官：具体考虑到其相隔的时间以及两个案件的差异，且行使律师职责和行使法官职能并未在时间上重叠，本法院认为申请人对法官的公正性不具有客观合理的怀疑 (*Puolitaival and Pirttiaho v. Finland*, §§ 46-54);
- 在一个案件中，若干已经就案件作出决定的法官被要求判断他们是否在该决定中存在失误，且其他三个法官已经在该案件中表达了其自己的观点，本法院认为这构成对公正性原则的违背 (*Driza v. Albania*, §§ 78-83 – violation);
- 法官之一参与了关于法律本身的上诉程序，在之前作为中级法院的法官参与了该案件 (*Peruš v. Slovenia*, §§ 38-39)。

▪ 有关个人品质的情形

166. 若法官对案件有个人利益，则公正性原则也会被侵害 (*Langborger v. Sweden*, § 35; *Gautrin and Others v. France*, § 59)。

167. 法官和案件当事一方或其代理人之间存在职业或个人牵连，也可能引起对公正性的质疑 (*Pescador Valero v. Spain*, § 27; *Tocono and Profesorii Prometeiști v. Moldova*, § 31; *Micallef v. Malta* [GC], § 102)。间接因素也可能被考虑 (*Pétur Thór Sigurðn v. Iceland*, § 45)。

IV. 程序要求

1. 公平

第六条第一款: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时，任何人有理由受到……审判机构…的公平审讯…”

(a) 一般性原则

168. 显著地位: 本法院一直强调受到公平审理权利在民主社会中的显著地位 (*Airey v. Ireland*, § 24; *Stanev v. Bulgaria* [GC], § 231)。这项保障是公约意义中的民主社会里的一项基本原则 (*Pretto and Others v. Italy*, § 21)。因此不得对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做限制解释 (*Moreira de Azevedo v. Portugal*, § 66)。公平性要求适用于诉讼程序全程，并不限于当事人间的审理 (*Stran Greek Refineries and Stratis Andreadis v. Greece*, § 49)。

169. 内容: 民事诉请必须能够被提交给法官 (*Fayed v. the United Kingdom*, § 65; *Sabeh El Leil v. France* [GC], § 46)。第六条第一款详细描述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被赋予的程序保障。其旨在确保当事方的利益以及司法权的正当行使 (*Nideröst-Huber v. Switzerland*, § 30)。因此诉讼当事人必须能够在其案件中做出有效辩论 (*H. v. Belgium*, § 53)。

170. 国家机关的角色: 本法院一直表明国家机关必须在个案中确保公约意义下的公平审理的要求得到满足 (*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 33 *in fine*)。

171. 诉讼当事人的主张: 在确定其本院¹²判例法所定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时，原则上，每个人都应受到法庭公平审理。第六条第一款为此增添了关于法院组成及组织机构记忆诉讼程序的进行等方面的保障。总之，以上所有共同构成被公平审判的权利 (*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6)。

172. 法律解释的原则:

- 民事诉请必须能够被提交给法官的原则是一项被普遍承认的基本法律原则；国际法上禁止司法拒绝的原则也是如此。第六条第一款必须在这些原则下解读 (*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5);
- 第六条第一款保障的被法院公平审理的权利必须给予公约的前言予以解释，前言中申明了法治是缔约国的一项普遍继承物 (*Brumarescu v. Romania*, § 61; *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 57);
- 司法确定原则是法治的重要组成之一 (*Beian v. Romania (No. 1)*, § 39);
- 在公约语境下的民主社会中，享受公平司法的权利享有突出地位，因此对第六条第一款的任何限制解释都不符合该规定的宗旨 (*Ryakib Biryukov v. Russia*, § 37);
- 同时，公约不保障任何理论性或虚幻的权利，只保障现实和有效的权利 (*Airey v. Ireland*, § 24)。

173. 国家在民事案件中享有更大的自由: 本法院承认“公平审理”概念所包含的要求在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中并不必须相同：“缔约国在处理关乎公民权利义务的民事案

¹². 参见：“范围”一节。

件时比其处理刑事案件享有更大的自由” (*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 32; *Levages Prestations Services v. France*, § 46)。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6 § 1 as regards cases concerning civil rights are less onerous than they are for criminal charges (*König v. Germany*, § 96)。

(b) 范围

174. 有效的权利: 诉讼参与方有权将其认为相关的发现提交给法庭。仅当其发现被现实地听取，即被受理法院合法地考量之后，该权利才能被认为有效 (*Kraska v. Switzerland*, § 30;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 59; *Perez v. France*, § 80)。为使本条所保障的权利切实有效，国家机关必须尽职: 关于无律师代表的上诉人，参见 *Kerojärvi v. Finland*, § 42 以及 *Fretté v. France*, § 49; 关于有律师代表的上诉人，参见 *Göç v. Turkey* [GC], § 57。

175. 上诉人正当参与诉讼程序，要求法院主动与上诉人就案件材料进行沟通。因此，申请人对未经沟通的相关材料并无异议或者率先查看案件材料等情形都不重要 (*Kerojärvi v. Finland*, § 42)。上诉人仅具有查询案件材料且获得复印件的可能性本身还不足以构成保障 (*Göç v. Turkey* [GC], § 57)。

176. 行政机关所负义务: 上诉人必须有权查看行政机关占有的相关材料，必要时可通过文件公示程序 (*McGinley and Egan v. the United Kingdom*, §§ 86 and 90)。。如果被国家无正当理由阻止上诉人查看其占有的有利于被告方的材料，或者不实地否认其存在，则这将具有否认上诉人公平审理权的影响，从而违反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参见前案)。

177. 对诉讼程序进行整体审查: 诉讼程序是否公平是基于对其整体的审查 (*Ankerl v. Switzerland*, § 38; *Centro Europa 7 S.R.L. and di Stefano v. Italy* [GC], § 197)

178. 因此，诉讼程序公平性的任何瑕疵，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在之后的阶段被弥补，无论是在同一级别 (*Helle v. Finland*, § 54) 或者来自上级法院 (*Schuler-Zgraggen v. Switzerland*, § 52; 反例参见 *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 36; *Feldbrugge v. the Netherlands*, §§ 45-46)。

179. 任何情况下，若最高司法机关存在瑕疵——例如不存在对提交给该机关的决定作出回应的可能性——则构成对公平审判权的侵害 (*Ruiz-Mateos v. Spain*, §§ 65-67)。

180. 仅当受争议的决定受到具有完全管辖权且提供了满足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要求的各种保障的独立死囑机构的审查时，作出该决定的程序瑕疵才能被弥补。重要的是上诉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范围，以及审查时基于案件具体情形做出的 (*Obermeier v. Austria*, § 70)。¹³

181. 未提供公平审理保障的初步决定: 在这类案件中，若上诉人享有由具有完全管辖权且能提供公约要求的保障手段的独立司法机构所提供的救济手段，则并不会产生有关公平性的问题 (*Oerlemans v. the Netherlands*, §§ 53-58;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Ltd v. the Netherlands*, § 78)。重要的是这种提供足够保障的救济手段的存在 (*Air Can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 62)。

182. 在上诉法院面前: 第六条第一款并未强迫缔约国设立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但是存在此类法院的国家必须确保诉讼当事人享有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基本保障。尽管

¹³. 同时参见“具有完整管辖权的法院的审查”一章

如此，该条款对上诉程序适用的方法要基于相关诉讼程序的特征；且必须整体考虑民主法律秩序中该程序的整体以及上诉法院（*Helmerts v. Sweden*, § 31）或最高法院所扮演的角色（*Levages Prestations Services v. France*, §§ 44-45; *K.D.B. v. the Netherlands*, § 41）。

183. 考虑到最高法院的角色特征，即被限制在审查法律是否被正确适用，其诉讼程序可以更加形式化（*Levages Prestations Services v. France*, §§ 48）。最高法院审理时要求当事人有专业律师作为代表并无违背第六条的规定（*G.L. and S.L. v. France*（裁定）；*Tabor v. Poland*, § 42）。

184. 限制：作为一项一般规则，案件事实由国内法院审查：本法院不对案件事实做出审查（*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 31）。¹⁴ 进一步而言，尽管上诉人享有将其认为相关的发现提交法庭的权利，第六条第一款并不保障该当事人获得一个良好的结果（*Andronicou and Constantinou v. Cyprus*, § 201）。

185. 外观理论：本法院强调过司法的外观的重要性；确保诉讼公正的透明十分重要。尽管如此，本法院明确表示相关个人的立场并非决定性的，诉讼个人对诉讼公平性的怀疑必须能够是客观公正的（*Kraska v. Switzerland*, § 32）。因此有必要审查法院是如何处理案件的。

186. 在其他终审案件中，本法院曾指出公众对司法公正越来越高的敏感度使得司法外观的重要性越来越高（*Kress v. France* [GC], § 82; *Martinie v. France* [GC], § 53 ; *Menchinskaya v. Russia*, § 32）。本法院在这些案件中赋予了外观以重要性（同时参见 *Vermeulen v. Belgium*, § 34; *Lobo Machado v. Portugal*, § 32）。

187. 司法实践：为了考虑本国司法制度的现状，本法院在审查本国法是否符合第六条第一款时，一直对本国司法实践予以重视（*Kerojärvi v. Finland*, § 42; *Gorou v. Greece (No. 2)* [GC] § 32）。事实上，在审查诉讼当事人是否被公平审理时，不得忽视案件的一般性事实和法律背景（*Stankiewicz v. Poland*, § 70）。

188. 国家机关不能摒弃法院在国家安全和反恐领域的有效控制：可使用技术手段对安全性的合法担忧与个人的程序权利相适应（*Dağtekin and Others v. Turkey*, § 34）。

189. 独立于结果和过程的原则：第六条第一款的程序保障适用于所有诉讼当事人，不仅是那些在国内法院未胜诉的当事人（*Philis v. Greece (No. 2)*, § 45）。

· 示例：判例法包含了多种情形，包括：

190. 法院提交给上诉法院的明显旨在影响其决定的发现：当事各方必须能够对该发现做出评论，无论其对法院的实际影响如何，即使这些发现并未提供任何未出现在上诉法院（*Nideröst-Huber v. Switzerland*, §§ 26-32）或本院审理时的被告国家政府（*APEH Üldözötteinek Szövetsége and Others v. Hungary*, § 42）所怀疑的决定中的事实或观点 or of the respondent Government before the Strasbourg Court.

191. 预备性问题：存在预备性参考机制的，本国法院拒绝提起此种请求，在特定情形下，可构成对程序公正的侵害（*Ullens de Schooten and Rezabek v. Belgium*, §§ 57-67, with further references）。当该拒绝行为被认定具有任意性时，则构成侵害：

- 相关规则不允许任何对预备性参考的例外或替代性措施，但仍然拒绝的；
- 基于法律规定之外的原因做出拒绝决定的；
- 或者该拒绝行为未依据相关规定被适当地论证。

¹⁴ 参见“第四种情形”一节。

192. 因此，第六条第一款并不保障由本国法院将案件提交至欧洲法院的任何权利 (*Dotta v. Italy* (裁定))。通过适用上述被引用的判例法，本法院审查该拒绝行为是否呈现任意性 (*Canela Santiago v. Spain* (裁定))。

193. 本国判例法的变化: 法律稳定和合法期待的要求并不包含接触设立的判例法体系的权利 (*Unédic v. France*, § 74)。判例法的发展本身并不与正当司法相矛盾，原因在于若不能维护动态且促进发展的途径，则改革和发展便会受到阻碍 (*Atanasovski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 38)。在该判决中，本法院认为良好设立的判例法体系的存在给最高法院施加了对其与判例法的分歧做出更加实质性解释的义务，否则个人享有的获得经合理论证的决定的权利便会受到损害。在一些案件中，本国判例法中影响尚在审的民事诉讼的变化可能违反公约的规定 (*Petko Petkov v. Bulgaria*, §§ 32-34)。

194. 关于判例法的分歧，本法院曾经强调设立机构从而保障法院实践的连续性以及判例法的统一性 (*Frimu and Others v. Romania* (裁定), §§ 43-44)。尽管如此，要实现法律的连续性可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因此未破坏法律稳定的判例法之间的冲突可以被容忍 (*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 83; *Albu and Others v. Romania*, §§ 36 and 40-43)。¹⁵

195. 一项法律在国家作为参与方的案件仍在进行时生效: 本法院特别关注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该法律具有影响国家作为当事方的案件的司法决定的效力，包括具有使待定案件丧失可胜诉能力的作用——所具有的内在危险性 (*National & Provincial Building Society, Leeds Permanent Building Society and Yorkshire Building Society v. the United Kingdom*, § 112)。原则上，在民事案件中，立法机关并未被预先阻止颁布新的具有溯及力的规定从而对既有法律下的权利予以规范。但是，第六条排除了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施加的旨在影响其对争议做出司法决定的干涉，除非具有广泛关注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Zielinski and Pradal and Gonzalez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57;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 126)。

举例而言，本法院发现在下述方面存在对公约的违反:

- 立法机关的干涉——当国家作为当事方的案件被待定达九年时间时，且申请者获得一项最终可执行的判决——向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对即将出台的案件结果施加影响 (*Stran Greek Refineries and Stratis Andreadis v. Greece*, §§ 49-50);
- 一部对即将出台的案件结果具有有利于国家一方的决定性影响的法律 (*Zielinski and Pradal and Gonzalez and Others v. France*, [GC], § 59);
- 在终审程序的关键时期，出台了一部法律使得争议被解决且诉讼程序的进行毫无必要性 (*Papageorgiou v. Greece*);
- 上诉法院所做出的是基于，甚至依附于，在诉讼过程中生效且影响诉讼结果的法律 (*Anagnostopoulos and Others v. Greece*, §§ 20-21)。

尽管如此，第六条第一款不得被解释为阻止权力机关对其参与的待定司法程序进行任何干涉。在其他案件中，本法院认为被告国家依据的考虑因素是基于用于赋予法律溯及力正当性的强烈的公共利益动机 (*National & Provincial Building Society, Leeds Permanent Building Society and Yorkshire Building Society v. the United Kingdom*, § 112; *Forrer-Niedenthal v. Germany*, § 64; *OGIS-Institut Stanislas, OGEC Saint-Pie X and*

¹⁵. 同时参见“第四审”部分。

Blanche de Castille and Others v. France, §§ 71-72; *EEG-Slachthuis Verbist Izegem v. Belgium* (裁定)。

196. 本判决法也适用于国家虽不是当事方但通过气立法权利破坏了诉讼程序的案件 (*Ducret v. France*, §§ 33-42)。

197. 其他类型的立法干涉:

- 法律可以在诉讼开始前 (*Organis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infirmiers libéraux (O.N.S.I.L.) v. France* (裁定)) 或诉讼结束后 (*Preda and Dardari v. Italy* (裁定)) 被颁布而不会引起关于公约第六条的争议;
- 一般性法律的颁布即使没有现实地指向待定的司法程序或借此规避法治的原则, 也可能被证明是对诉讼当事人不利的 (*Gorraiz Lizarraga and Others v. Spain*, § 72);
- 在诉讼程序进行中, 一部法律可以被宣布违宪, 只要该行为并无影响该诉讼的目的 (*Dolca v. Romania* (裁定))。

198. 在最高院的审判中, 未与诉讼当事人就国家法律服务机构的独立成员的观察进行沟通 (公共检察部的成员): *Vermeulen v. Belgium, Van Orshoven v. Belgium; K.D.B. v. the Netherlands* - 主要的公共检察官/总检察长: *Göç v. Turkey* [GC]; *Lobo Machado v. Portugal* - 政府委员: *Kress v. France; Martinie v. France* [GC], 没有回应这些观察的机会: 很多被告国家辩称国家法律服务中的这类人员既不是诉讼参与方也不是任何一方的同盟或敌对者, 但是本法院发现对这些相关人员在诉讼中起到的现实作用必须予以考虑, 更确切的是, 考虑其观点的内容和影响 (*Vermeulen v. Belgium*, § 31; *Kress v. France* [GC], § 71 *in fine*)。

199. 本法院强调过, 在民事案件中, 若国家法律服务机构的独立成员提交的意见未提前交予当事各方讨论, 则剥夺了其作出回应的机会, 在此类案件中, 对抗性的程序显得尤为重要 (*Vermeulen v. Belgium*, § 33; *Lobo Machado v. Portugal*, § 31; *Van Orshoven v. Belgium*, § 41; *Göç v. Turkey* [GC], §§ 55-56; *Kress v. France*, § 76; *Immeubles Groupe Kossier v. France*, § 26)。

200. 在上述提及的人员公开表达其对案件的观点之后, 其对该案件的任何参与, 甚至仅仅是出现, 无论主动或被动, 都应被予以谴责 (*Vermeulen v. Belgium*, § 34; *Lobo Machado v. Portugal*, § 32; *Kress v. France*, § 87)。这项判例主要是基于外观理论¹⁶ (*Martinie v. France* [GC], § 53)。

201. 因此, 为了确定问题是否应归结于诉讼当事人的行为或国家的态度或可适用的法律 (*Fretté v. France*, §§ 49-51), 诉讼发生的状况必须被审查, 更具体而言, 该诉讼程序是否是对抗性的, 切是否满足双方力量对等的原则 (比较 *Kress v. France*, § 76, 和 *Göç v. Turkey* §§ 55-57)。

关于欧洲法院的案件¹⁷: *Coöperatieve Producentenorganisatie van de Nederlandse Kokkelvisserij U.A. v. the Netherlands* (裁定)。

202. 限制:

- 力量对等并不表示, 在审理前, 未向对方或法官披露己方观点的当事方方享有要求对方向其披露观点的权利 (*Kress v. France*, § 73);

¹⁶. 见上文。

¹⁷.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 承认一项并无实际范围或实质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情形是指，由于所采取的法律解决手段在法律上是不容置疑的，所依据的公约下的权利在该案件的结果中根本不可能发生 (*Stepinska v. France*, § 18)。

(c) 第四审诉求¹⁸

(i) 一般性原则

203. “第四审”诉求是提交到法院的一类特殊诉求类型。“第四审”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出现在公约里而是来自公约机构确立的判例法(*Kemmache v. France (No. 3)*, § 44) – 有些矛盾的是，这类诉求混淆了法院的真正身份：其不是一个上诉法院或者推翻缔约国国内法院判决的法院或者可以再审缔约国国内法院已审案件的法院，又或者可以像最高法院一样重审案件的法院。第四审申诉是由于两个层面的长期误解而产生的。

204. 首先，申诉人一方对欧洲人权公约确立的欧洲人权法院这一司法机构的身份和性质有一个普遍的理解。本法院不可替代本国法院的角色；法院的权力应限定在确认缔约国是否遵守其在加入公约及其议定书时作出的人权承诺。此外除了不能直接干预缔约国的法律体系外，法院还要尊重国家内法律系统的自治性。这意味着法院不可处理缔约国国内法院在事实或法律方面的错误，除非其已经侵害到了公约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法院不能因为国内法院根据某案件事实为何采纳某个决定而非其它决定，而自己对案件事实作出评判，否则其即事实上扮演了第三审或第四审法院的角色，超越了其自身的权限(*García Ruiz v. Spain* [GC], § 28)。

205. 其次，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中的“公正”的确切含义也经常误解。即公约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正”不是指“实体”公正（该概念是部分法律部分伦理的，只能由审判法官来具体评判），而是“程序”公正。具体说即在对抗制诉讼程序中要听取双方的意见且双方应被平等对待(*Star Cate Epilekta Gevmata and Others v. Greece* (裁定))。程序公正总是在整体上被衡量的，因此孤立的违法行为可能并不足以否定整个诉讼的公正性 (*Miroļubovs and Others v. Latvia*, § 103)。

206. 进一步而言，本法院尊重欧洲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多样性，并且本法院并不承担使其标准化的任务。正如若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任意性行为时，本法院不承担审查本国法院决定的才智的任务 (*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 68, 89 和 94)。

(ii) 本法院监督的范围和限制

207. 本法院一直表示其不处理缔约国国内法院在事实和法律上的错误，除非该错误十分明显且已经侵害了公约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 (*García Ruiz v. Spain* [GC], § 28; *Perez v. France* [GC], § 82; 在 *Dulaurans v. France* (§ 38)案中，本法院基于“判决中的明显错误”认定了对第六条第一款的违反，反例可参见 *Société anonyme d’habitations à loyers modérés terre et famille v. France* (裁定))。

208. 这意味着作为一般规则，本法院不对下列本国法院的发现和结论提出质疑：

- (a) 案件事实的确定：本法院不得质疑本国法院的发现，除非其具有恶劣且明显的武断行为 (*García Ruiz v. Spain* [GC], §§ 28-29)。
- (b) 本国法的解释和适用：优先由本国法院解决该国法律的解释问题 (*Perez v. France* [GC], § 82)，而不是由本法院解决，因为本法院的职责在于核实其解释是否符合公约的要求 (*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 49)。在

¹⁸.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受理标准实践指南》的相关内容。

一些例外的案件中，若本国法院在解释本国法律时是明显武断的或错误的，本法院可以就法律的解释做出适当的结论 (*Barać and Others v. Montenegro*, §§ 32-34, 包括进一步参考; *Andelković v. Serbia*, §§ 24-27 (司法拒绝); 同时参考 *Laskowska v. Poland* § 61), 但这经常发生在公约其他条款下, 而并未第六条第一款 (*Kushoglu v. Bulgaria*, § 50; *Işyar v. Bulgaria*, § 48; *Fabris v. France* [GC], § 60)。

- (c)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¹⁹: 第六条第一款提供的保障仅限于诉讼阶段对证据的处理。证据能力以及证据被审核的方法主要是国内法院处理的事项, 因为国内法院负有衡量其收到的证据的任务 (*García Ruiz v. Spain* [GC], § 28; *Farange S.A. v. France* (裁定))。

209. 因此第六条第一款并不允许本法院质疑一项民事纠纷结果的实体公正性, 在此类纠纷中, 时常是参与方一方胜诉, 其他参与方败诉。

210. 如果申请者在对抗性诉讼中享有利益; 其能够在诉讼不同阶段援引其认为与案件相关的论点和证据; 其有机会有效挑战向对方援引的论点和证据; 其所有被客观审查过的与案件处理结果相关论点均被法院按照规定予以听取和审查; 被审理的决定的所有事实和法律原有最终被披露; 以及诉讼程序因此在整体上是公正的, 则本法院会拒绝基于公约第六条第一款的第四审申诉 (*García Ruiz v. Spain* [GC], § 29)。大部分第四审申请被独任法官或三人委员会宣布不予受理 (公约第 27 及 28 条)。反例可参见, *Donadzé v. Georgia*, § 35。

(iii) 国内判例法的连续性

211. 第六条第一款并未赋予要求判例法保持稳定性的权利。判例法的发展本身并不与司法公正相矛盾, 因为其若不保持动态和发展的状态, 则会有危害改革和进步的风险 (*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 58)。

212 原则上, 即使是在明显具有可比性和关联性的案件中, 本法院也不对独立性应得到尊重的本国法院发布的不同决定进行比较。判例法的“分歧可能性”是任何建立在由在其管辖领域内享有权力的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组成的网络上的司法体系的内在必然特征 (*Santos Pinto v. Portugal*, § 41)。进一步而言, 若诸事项的现实情形在客观上完全不同, 则没有必要谈“分歧” (*Uçar v. Turkey* (裁定))。

213. 因此, 可能存在由于判例法分歧而导致被认定违反第六条第一款的案件。在此, 基于该分歧存在于法院的同一机构或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之间, 本法院衡量的要求有所不同。

214. 第一种情形, 具有分歧的诸决定是由一个单一的国内最高法院发布, 或由法律体系同一分支中负责终审程序的不同法院发布。 在此类案件中, 相互冲突的诸判决的持续性造成了可能有损司法公信力的法律不稳定的状态, 这种公信力是法治国家最根本的组成之一。本法院基于三个主要标准来逐案审查这些不稳定性:

- (a) 判例法分歧是否持续且具有深远意义;
- (b) 本国法是否提供了足以解决这种不一致性的机制; 以及
- (c) 这些机制是否被适用, 在何种程度上被适用。缔约国有义务规划其司法体系, 以避免发布此类具有分歧的判决, 同时通过适当地程序手段解决任何严重的矛

¹⁹. 同时参见证据审查部分。

盾(*Beian v. Romania (No. 1)*, §§ 37 et 39; *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 56-57 and 80)。

本法院考虑的一项额外标准是此种不一致是否仅限于一个孤立案件，或是影响了数量众多的人(*Albu and Others v. Romania*, § 38)。

215. 第二种情形是，相冲突的诸决定分别是在终审程序中，由归属于司法体系不同分支的法院发布，这其中的每个法院均是其独立体系中的最高法院。在此第六条第一款并未要求设立纵向的审查机制或一般性的规范机构（例如司法争议法院）。在具有多个系列法院的司法体系中，其中并存多个最高法院且被均要求对法律作出解释，此时要获得判例法的稳定性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因此不足以破坏法律稳定性的相冲突的判例法在一段时间内将会被容忍(*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 81-83 & 86)。

(d) 对抗性程序

216. 对抗原则：公正审判的概念包含了享有对抗性程序的基本权利。

217. 享有对抗性程序的权利所延伸出的要求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基本相同(*Werner v. Austria*, § 66)。

218. 不得基于节省时间加快诉讼进程而未被这项基本原则(*Nideröst-Huber v. Switzerland*, § 30)。

219. 内容：享有对抗性程序的权利主要意味着刑事或民事案件的参与方有机会对所有旨在影响法院判决的被采纳的证据或被提交的答辩进行了解并做出评论，即使是国家法律服务体系的独立成员采纳的证据或提交的答辩也不例外(*Ruiz-Mateos v. Spain*, § 63; *McMichael v. the United Kingdom*, § 80; *Vermeulen v. Belgium*, § 33; *Lobo Machado v. Portugal*, § 31; *Kress v. France* [GC], § 74)。这项要求可以适用于宪法法院审理的案件(*Milatova v. the Czech Republic*, §§ 63-66; *Gaspari v. Slovenia*, § 53)。

- 法院判决的实际效果并无太大意义(*Nideröst-Huber v. Switzerland*, § 27; *Ziegler v. Switzerland*, § 38);
- 享有对抗性程序的权利必须能够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被行使：诉讼参与一方必须有熟知法院收到的证据的可能性，以及在适当时间内通过适当形式对证据的存在，内容以及可信度予以评价的可能性(*Krčmář and Others v. the Czech Republic*, § 42; *Immeubles Groupe Kossier v. France*, § 26), 必要时可延期行使(*Yvon v. France* § 39);
- 诉讼参与方应当有机会为了胜诉而降任何证据予以公开(*Clinique des Acacias and Others v. France*, § 37);
- 法院本身必须尊重对抗性原则，例如其判定对法律要点提出上诉的权利已经由于申诉不应被受理而丧失时(*Clinique des Acacias and Others v. France*, § 38; 比较 *Andret and Others v. France* (裁定), 不可受理：在最后这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告知各方新的论点被提出，各方享有在最高法院发布判决前作出回应的机会);
- 由争议的当事方单独决定是否对另一方提供的文件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做出评论。诉讼当事人对司法运作的信任是基于他们有机会对任何文件表达观点这一认知（也包括法院自己获得的文件：*K.S. v. Finland*, § 22) (*Nideröst-Huber v. Switzerland*, § 29; *Pellegrini v. Italy*, § 45)。

220. 未披露以下文件或证据而侵害对抗性诉讼的权利:

- 在关于安置一个儿童的诉讼中，包含该儿童和案件背景详情且提出建议的报告，即使在审判过程中其父母被告知了其中的内容 (*McMichael v. the United Kingdom*, § 80);
- 检察官提交的证据，无论其是否被视为案件“当事方”，因为其旨在基于所负职责对法院的判决施加可能不利于相关当事人的影响 (*Ferreira Alves v. Portugal (No. 3)*, §§ 36-39);
- 由下级法院提交给上诉法院旨在影响后者判决的纸条，即使此纸条未呈现任何新的事实或理由 (*Ferreira Alves v. Portugal (No. 3)*, § 41);
- 法官只有占有的包含有关案件实体内容且被论证过的意见的文件 (*K.S. v. Finland*, §§ 23-24)。

221. **限制**: 享有对抗性诉讼的权利并非绝对，根据案件的特定情形，其范围有所不同 (*Hudakova and others v. Slovakia*, §§ 26-27)。对抗性原则不要求各方必须向对方转交尚未提交给法庭的文件 (*Yvon v. France*, § 38)。也不要求制作不足以影响案件结果的纪念物 (*Asnar v. France (no. 2)*, § 26)。

(e) 平等武装

222. **平等武装原则** 是广义的公正审判概念的应有之义。“平等武装”的要求，从诉讼各方适当平衡的意义上讲，同时适用于民事和刑事案件 (*Feldbrugge v. the Netherlands*, § 44)。

223. **内容: 保持诉讼各方适当平衡**: 等臂原则意味着诉讼各方必须享有合理机会呈现其案件——包括其证据——且不得因此而被置于相对于其他当事方实质上不利的境地: *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 33。

- 不允许一方向法院提交意见却未告知向对方而导致对方丧失答复的机会。由当事各方独立决定是否有必要向某一件作出回应 (*APEH Üldözötteinek Szövetsége and Others v. Hungary*, § 42);
- 尽管如此，向法院提交的答辩未告知任何其他一方，这不构成对等臂原则的违反，但违反了广义的程序公正 (*Nideröst-Huber v. Switzerland*, §§ 23-24; *Clinique des Acacias and Others v. France*, §§ 36-37)。

224. 不符合等臂原则的例子:

- 一方的上诉未告知对方，对方因此丧失回应的可能性 (*Beer v. Austria*, § 19);
- 期间仅对当事人一方停止，使另一方出于实质上不利地位 (*Platakou v. Greece*, § 48; *Wynen v. Belgium*, § 32);
- 两个关键证人中仅有一位被准许出庭作证 (*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 34-35);
- 对立方享有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优势，在诉讼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且对法院的判断施加了重大影响 (*Yvon v. France*, § 37);
- 一方享有可将其置于优势的地位或只能，且法院不允许相对的另一方援引相关文件或提供认证，从而其很难对优势方予以挑战 (*De Haes and Gijssels v. Belgium*, §§ 54 and 58);

-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给出的原因太过概要和泛化以至于不能使得上诉人对其审查提出挑战；并且审查事实的法庭不允许申请人提交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意见 (*Hentrich v. France*, § 56);
- 拒绝向诉讼一方给予法律援助剥夺了他们面对一个富有的对手时有效地参与诉讼的机会 (*Stee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 72);
- 在 *Martinie v. France* [GC] 议案的判决中 (§ 50)，本法院认为，考虑到政府律师在审计法院的诉讼中的地位：不同于其他参与方，其在庭审中列席，被提前告知报告法官的观点，且在庭审中听取报告法官的意见，全程参与诉讼程序且能在不受其他方反驳的情况下口头表达其观点，存在对诉讼当事人不利的不平衡，而审判未被公开的事实则加重了这种不平衡；
- 检察官为支持申请人对立方的观点而进行了干涉 (*Menchinskaya v. Russia*, §§ 35-39)。

225. 但是，本法院认为，庭审中对不同证人的一个差别对待（一方的言词证据是经宣誓后陈述但另一方没有）由于其并未实际影响审判的最终结果，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Ankerl v. Switzerland*, § 38)。

226. 公民个人提起的特定案件: 本法院区分了公民个人提起的诉讼和公共检察官提起的诉讼，后者享有公共权力且有责任保障公共利益 (*Guigue and SGEN-CFDT v. France* (裁定))。因此，提起上诉时的不同形式要件和时间限制（个人提起的案件有更短的时间限制）并不违背等臂原则，前提是这种救济手段能够起到有意义的作用（比如相关体系的特殊性质）。

227. 本法院也认为，一项法规，仅限制公民上诉可能性却并未限制公共检察官的该种可能性，并不违反等臂原则，原因在于公民一方和检察官的角色和目的是明显不同的 (*Berger v. France*, § 38)。

228. 对于检察机关和私主体之间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基于保护法律秩序的目的享有特权地位。但是，这不得导致民事诉讼的一方相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具有不公平的劣势 (*Stankiewicz v. Poland*, § 68)。

(f) 证据审查

229. 一般原则²⁰: 公约并未就证据制定规则 (*Mantovanelli v. France*, § 34)。证据的证据能力以及证据审查的方式主要由国家法律和国家法院处理 (*García Ruiz v. Spain* [GC], § 28)。这同样适用于证明力和举证责任问题 (*Tiemann v. France and Germany* (裁定))。国家法院同样要审查被提交的证据的相关性 (*Centro Europa 7 S.r.l. and Di Stefano v. Italy* [GC], § 198)。

- 尽管如此，公约赋予本法院的任务是确定诉讼整体是否公正，包括证据被采纳的方式 (*Elsholz v. Germany* [GC], § 66)。因此其必须确定证据是否通过旨在保障审判公正的方法被呈现 (*Blucher v. the Czech Republic*, § 65);
- 国家法院有义务对各方提交的观点、意见和证据进行适当的审查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 59)。

(i) 人证

²⁰. 同时参见“第四审”一节。

230. 第六条第一款并未明确保障要求证人出庭的权利，并且人证的证据能力原则上是由国内法院处理的事项。尽管如此，诉讼程序的整体，包括证据被采纳的方式，必须符合第六条第一款下的“公正”要求 (*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 31)。

- 若本国法院驳回了让证人出庭的请求，它们必须给出足够的理由且驳回决定不能是武断的：不得给诉讼当事人提出支持其自身立场的论点的能力造成不合理的限制 (*Wierzbicki v. Poland*, § 45);
- 在庭审中对各方证人的区别对待可能构成对“等臂原则”的侵害 (*Ankerl v. Switzerland* § 38): 但在此案中，本院认为改区别对待并未将申请者置于相对于对方而言实质性的不利地位 (§ 38 最终) – 反例参见 *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 35) 事件亲历者中的两人只有一人被允许作证（违反）。

(ii) 专家意见

231. 拒绝寻求专家意见:

- 法院拒绝寻求专家意见本身并未不公正；本法院必须确定诉讼程序在整体上是否公正 (*H. v. France*, § 61 and 70)。拒绝的原因必须合理;
- 在一个有关儿童抚养和探视的案件(*Elsholz v. Germany* [GC], § 66, 加之必要的变更 *Sommerfeld v. Germany*, [GC], § 71);
- 在一个诱拐儿童案中 (*Tiemann v. France and Germany* (裁定)) 本法院审查了上诉法院是否就其拒绝申请人寻求第二专家意见的请求给出了充分的原因，从而确定该拒绝决定是否合理。

232. 专家的任命: 如同对第六条第一款中包含的其他程序保障的遵守，遵守对抗性原则与法院内的诉讼程序相关；这一规定并未一般性、原则性地要求在法院任命专家后，诉讼各方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参与专家主持的面试或接触所有专家已经考量过的文件。

233. 重要的是诉讼各方应当能够正确参与诉讼程序 (*Mantovanelli v. France*, § 33)。

234. 专家欠缺中立性，连同其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角色，能诉讼中的平衡向一方倾斜而对另一方不利，这便违背了等臂原则 (*Sara Lind Eggertsdottir v. Iceland*, § 53); 此外，专家可在诉讼程序中享有优势地位，并对法院的审理施加巨大影响 (*Yvon v. France*, § 37)。

235. 一份关于超出法官知识结构的技术领域的医学专家报告很可能对法官审查事实施加巨大的影响；这是一项关键证据，并且诉讼各方必须能够有效地对之做出评论 (*Mantovanelli v. France*, § 36; *Storck v. Germany*, § 135)。

- 在 *Mantovanelli v. France* 案中 申请者不能对作为关键证据的专家报告中的发现做出有效评论，这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
- 在 *Augusto v. France* 案中 法院未将被委任的医生做出的关于申请人是否符合享受福利待遇的医学标准的意见——很可能是对判决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证据——予以披露，尽管该意见在法律上对法官并无约束力，但这仍然违反了第六条第一款。

236. 关于 诉讼参与方关于专家的权利: 比较 *Feldbrugge v. the Netherlands*, § 44 (违反) 和 *Olsson v. Sweden (No. 1)*, §§ 89-91 (未违反)。关于要求披露一份不利的报告，参见: *L. v. United Kingdom* (裁定)。

(g) 司法决定的论证

237. 第六条第一款包含的保障包括法院有义务对其作出的决定给予充分的理由 (*H. v. Belgium*, § 53)。一个被充分论证的决定向诉讼各方表明其案件受到了切实地审理。

238. 尽管本国法院在采纳理由和认可证据时享有一定的裁量权，但其有义务通过出具判决理由而使起决定具有正当性 (*Suominen v. Finland*, § 36)。

239. 出具的理由必须能确保当事各方有效利用其现有的申诉权 (*Hirvisaari v. Finland*, § 30 最后)。

240. 第六条第一款要求法院为其决定出具理由，但不可被理解为要求法院对所有论点都作出详细回答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 61; *Garcia Ruiz v. Spain* [GC], § 26; *Jahnke and Lenoble v. France* (裁定); *Perez v. France* [GC], § 81)。

241. 法院给出理由的义务，因该决定的性质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Ruiz Torija v. Spain*, § 29; *Hiro Balani v. Spain*, § 27) 具体的程度职能根据案件具体情形来判定：特别有必要考虑的是诉讼当事人在庭上可能提出的观点的多样性以及各缔约国在强制性规范、习惯规则、法律意见以及判决的陈述和起草上存在的差异 (*Ruiz Torija v. Spain*, § 29; *Hiro Balani v. Spain*, § 27)。

242. 尽管如此，一方的观点对诉讼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则要求对其有具体和明确的答复 (*Ruiz Torija v. Spain*, § 30; *Hiro Balani v. Spain*, § 28)。

243. 因此，本国法院需要审查：

- 诉讼当事人的主要主张 (*Buzescu v. Romania*, § 67; *Donadze v. Georgia* §35);
- 与公约及其议定书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相关的申诉：本国法院必须对此进行严格细致地审查 (*Wagner and J.M.W.L. v. Luxembourg*, § 96)。

244. 上诉法院仅通过直接适用特定法律规范驳回毫无胜诉希望的就法律要点提出的上诉请求，未作出进一步解释的，第六条第一款并不要求其提供更多的详细论证 (*Burg and others v. France*, (裁定); *Gorou v. Greece (No. 2)* [GC], § 41)。

245. 类似地，在有关申请上诉许可的案件中，当这种许可是上级法院审理该案件及做出最终判决的前提条件，第六条第一款不得被理解为若拒绝许可则必须给出详细的理由 (*Kukkonen v. Finland no. 2*, § 24; 同时参见 *Bufferne v. France* (裁定))。

246. 进一步而言，驳回请求时，上诉法院原则上可以仅赞同下级法院判决中的理由 (*Garcia Ruiz v. Spain* [GC], § 26 – 反例 *Tatishvili v. Russia*, § 62) 但是，程序公正的理念要求仅对其决定给出很少理由的国家法院，无论是通过合并下级法院的理由或是其他通过其他方式，必须在事实上处理了提交给其处理的核心事项，且没有未经进一步判断便草率认同下级法院提交的意见 (*Helle v. Finland*, § 60)。诉讼当事人在国内诉讼中不能在审判中进行口头陈述时，上述要求显得更为重要 (参见前案)。

2. 公开审讯

第六条第一款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决定对某人确定任何刑事罪名时，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构的公平且公开的审讯。判决应当公开宣布。但是，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对民主社会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护当事人的私生活权利的考虑，或者是法院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公开审讯将损害公平利益的话，可以拒绝记者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者部分审讯。”

(a) 审讯

247. 一般原则: 原则上，若不存在第六条第一款中规定的例外情形（见前文，进一步的分析参见下文），诉讼当事人应当有权受到公开审理。公开审讯保护诉讼当事人免于遭受不受到公众监督的秘密司法。司法透明有利于第六条第一款目的的实现，即公正审判 (*Diennet v. France*, § 33; *Martinie v. France* [GC], § 39)。

248. 未确定审判是否具有公开性，需要对诉讼程序进行整体考察 (*Axen v. Germany*, § 28)。

249. 在一审程序中，第六条第一款下“受到公开审理的权利”要求进行口头审理 (*Fredin v. Sweden (No.2)*, §§ 21-22; *Allan Jacobsson v. Sweden (No. 2)*, 和 § 46; *Göç v. Turkey* [GC], § 47) 除非具有可以不公开审理的特殊情形 (*Hesse-Anger v. Germany*, (裁定))。

250. 可不进行口头审理的情形的特征本质上是基于法院受理事项的性质，而不是这些情形发生的频率 (*Miller v. Sweden*, § 29; *Martinie v. France* [GC], § 41)。

251. 基于相关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在二审或三审程序中可以不进行审讯，前提是一审程序中已经进行过审讯 (*Helmerts v. Sweden*, § 36, 相反 §§ 38-39)。因此，请求准许上诉的程序以及仅涉及法律问题的程序中，即使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未给予上诉人被审讯的机会，也可能不违反第六条的规定 (*Miller v. Sweden*, § 30)。

252. 相应的，除非有法定的特殊情形，第六条第一款下的公开审讯权要求至少在各级审判中至少有一次审讯 (*Fischer v. Austria*, § 44; *Salomonsson v. Sweden*, § 36)。

253. 根据一般且绝对的原则，在非公开状态下进行的关于案件实体的民事诉讼，其中诉讼当事人不能基于其案件特殊性要求公开审讯的，这类诉讼不得在原则上被认为与第六条第一款相符；除了在完全例外情形中，诉讼当事人必须至少由要求公开审讯的机会，即使法院可以基于案件情形和恰当的原因予以拒绝 (*Martinie v. France* [GC], § 42)。

254. 最后，诉讼关键阶段中审讯的欠缺能，也或者不能在后续阶段中被有效救济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60-61; *Malhous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 62)。

255. 具体应用:

- 若不存在有必要进行审讯的与可信度相关的事项或存疑的证据，且法院能够公平合理地基于诉讼各方的意见和其他材料对案件作出决定的，审讯可以不必进行 (*Döry v. Sweden*, § 37; *Saccoccia v. Austria*, § 73);
- 本法院也赞同，在仅涉及较少或简单的法律本身的争议的案件中，进行审讯也是合理的 (*Allan Jacobsson v. Sweden (No. 2)*, §§ 48-49; *Valová and Others v. Slovakia*, §§ 65-68) (*Varela Assalino v. Portugal* (裁定); *Speil v. Austria* (裁定));

- 这也适用于技术含量较高的问题。本法院曾关注过有关社会安全利益的的争议的技术特征，相较于口头辩论，用文字手段处理这些问题更有效。本法院多次表示，出于效率和经济的考虑，在这个领域国家机关可以避免采用公开审讯的方式，原因在于机械地采用审讯的方式可能对社会安全程序中需注意的特定事项构成障碍 (*Schuler-Zraggen v. Switzerland*, § 58; *Döry v. Sweden*, § 41; 反例参见 *Salomonsson v. Sweden*, §§ 39-40)。

256. 相反，在例举如下的情形中，进行口头审讯被认为是必要：当法院的管辖权延伸至法律争议以及重要的事实争议 (*Fischer v. Austria*, § 44), 或审查权力机关是否正确认定事实(*Malhous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 60), 在要求法院获取对申请者的个人印象从而给予申请者个人或通过代表阐述其个人状况的权利 (*Miller v. Sweden*, § 34, 最终 *Andersson v. Sweden*, § 57) – 例如必须听取申请者与赔偿级别相关的个人遭遇时 (*Göç v. Turkey* [GC], § 51; *Lorenzetti v. Italy*, § 33) – 或通过此种方法使得法院能够对部分争议点予以澄清时(*Fredin v. Sweden (No. 2)*, § 22; *Lundevall v. Sweden*, § 39)。

257. 媒体和公众的出席: 获得公开审讯的权利在原则上要求有面对相关法院的公开审讯。但第六条第一款并不禁止法院基于案件特殊情形而决定排斥该原则(*Martinie v. France* [GC], § 40)。第六条第一款文本中包含了若干例外情形。

258. “可以拒绝媒体和公众参与旁听全部或部分审讯”:

- “基于对民主社会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国家安全的利益的考虑” (*B. and P. v. the United Kingdom*, § 39; *Zagorodnikov v. Russia*, § 26);
- “基于青少年利益或保护当事人私生活”: 在涉及未成年人在父母分居后的住所问题的诉讼中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的案件中，会涉及到青少年利益或对参与方私人生活的保护 (*B. and P.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但是，在涉及将儿童移交公共机构的案件中，必须对将案件从公众监督中抽离的原因进行仔细审查 (*Moser v. Austria*, § 97)。
至于对医生的纪律管理程序，尽管对职业秘密和父母私生活的保护可以使不公开审讯成为合理，但这必须要限制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 (*Diennet v. France*, § 34; 以及在一个针对律师的诉讼中, *Hurter v. Switzerland*, §§ 30-32)。
- “法院认为公开审讯会损害公平利益”: 通过限制诉讼的公开性来保护目击者的安全和隐私或者为追求正义而促进信息和意见的交流是可行的 (*B. and P. v. the United Kingdom*, § 38; *Osinger v. Austria*, § 45)。

259. 对公开审讯权的放弃: 无论第六条第一款的文本或精神都为禁止个人自愿通过明示或默示放弃公开审讯权，但这种放弃必须以明确方式作出，且不得未被任何重要的公共利益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9; *Håkansson and Stureson v. Sweden*, § 66; *Exel v. the Czech Republic*, § 46)。出庭传票必须被及时接收 (*Yakovlev v. Russia*, §§ 20-22)。

260. 放弃权利的条件: 当事人必须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9), 基于其自由意志做出同意的决定(*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 35)。权利放弃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作出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9)。但必须采取明确的方式 (*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 35, 和 *Håkansson and Stureson v. Sweden*, § 67) 且不得与公共利益相违背(*Håkansson and Stureson v. Sweden*, § 66)。

261. 请求公开审讯失败并不必然意味着当事人已经放弃了该项权利，必须结合相关本国法予以考察 (*Exel v. the Czech Republic*, § 47; *Göç v. Turkey* [GC], § 48)。如果适用的本国法明确排除了公开审讯的可能性，申请人是否请求进行公开审讯在所不问 (*Eisenstecken v. Austria*, § 33)。

262. 例如：在纪律程序中放弃公开审讯的权利：*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 59; *H. v. Belgium*, § 54。弃权表示不明确：*Schuler-Zgraggen v. Switzerland*, § 58; 反例参见 *Exel v. the Czech Republic*, §§ 48-53。

(b) 判决

263. 诉讼程序的公共特征保护诉讼当事人免于遭受未经公共监督的秘密司法 (*Fazliyski v. Bulgaria*, § 69, concerning a case classified secret: violation)。这也是保持司法公信力的方式 (*Pretto and Others v. Italy*, § 21)。

264. 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应当公开宣布”，这表示判决需要在公开的法庭中被宣读。但本法院发现“其他宣布判决的方式”也可能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要求 (*Moser v. Austria*, § 101)。

265. 未确定本国法中的公开形式是否符合第六条第一款对公开宣判的要求，“必须基于该诉讼程序的特点以及第六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对各案件中判决的公开形式做出审查 (*Pretto and Others v. Italy*, § 26, and *Axen v. Germany*, § 31)。第六条第一款追求的目标——确保公众对司法的监督从而保障司法公正——必须在诉讼过程的整体上被实现 (*Axen v. Germany*, § 32)。

266. 判决未被公开宣布的，必须确定其是否通过其他方式满足了必要的公开性。

267. 在如下案例中，足够的公开性被公开宣读之外的其他方式所实现：

- 上级法院未公开发布驳回就法律提出的上诉的决定：未确定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方法是否符合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必须考虑本国法律体系中实行的该诉讼程序的整体以及法院所扮演的角色 (*Pretto and Others v. Italy*, § 27)。未查明是否有违反第六条第一款的情形，本法院格外注意了诉讼的级别，和这些法院受到的监督——仅限于法律层面——以及他们发布的完全支持下级法院决定的判决。基于这些考虑，本法院发现法院通过将判决放置于法院书记处，使判决全文为公众所知，因此符合公开宣判的要求 (*Pretto and Others v. Italy*, §§ 27-28)，这同样适用于上级法院未经审讯而做出未维持下级法院已经宣读过的判决的情形 (*Axen v. Germany*, § 32)；
- 初审法院：初审法院通过审讯而作出判决但并未向公众发布，而上诉法院发布了一项概括并支持该下级法院决定的判决，此案中本法院认为不存在违反行为 (*Lamanna v. Austria*, §§ 33-34)；

268. 在以下案件中，未公布判决内容导致了对公约的违反：

- 在一个亲属和公共机构之间的有关儿童安置问题的案件中：：赋予在本案中具有诉讼利益的当事人接触文件的权利并且公开发表（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具有特殊意义的判决，不满足第六条第一款对公开性的要求 (*Moser v. Austria*, §§ 102-103)；
- 一审或者二审法院未公开审理拘留赔偿请求，且未公开发布且未以其他方式公开其决定 (*Werner v. Austria*, §§ 56-60)。

269. 仅判决的重要部分被公开宣读: 必须确定公众是否能够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未经宣读的判决, 以及公开的方式是否足以将判决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Ryakib Biryukov v. Russia*, §§ 38-46 and references cited therein, §§ 33-36)。公众不能获取申请者的诉请被拒绝的原因, 第六条第一款所追求的目的未得到实现 (参考前案, § 45)。

第六条第一款

“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时, 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审判机构的……审讯...”

3. 诉讼期间

270. 通过要求案件在合理时间内被审理, 公约强调了及时司法的重要性, 延迟审理可能会危及司法的效率和信用 (*H. v. France*, § 58; *Katte Klitsche de la Grange v. Italy*, § 61)。第六条第一款要求缔约国通过其司法体系来确保法院符合公约的各项要求。

271. 本法院多次强调及时司法的重要性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 224)。国家多次违反此要求从而构成了对公约的违反 (*Bottazzi v. Italy* [GC], § 22)。

(a) 诉讼期间的确定

272. 关于相关时间段的起始点, 一般而言, 期间从案件提交到法院时开市起算 (*Poiss v. Austria*, § 50; *Bock v. Germany*, § 35), 除非在法院程序开始前必须向行政机关提出前置性申请, 这种情况下诉讼进行的期间可包括强制的前置性行政程序的时间 (*König v. Germany*, § 98; *X. v. France*, § 31; *Kress v. France* [GC], § 90)。

273. 因此, 在一些情形中, 在受诉法院发布令状之前, 诉讼期间便开始计算 (*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 32 in fine *Erkner and Hofauer v. Austria*, § 64; *Vilho Eskelinen and Others v. Finland* [GC], § 65)。但是, 这是例外情形且仅当特定前置步骤对诉讼程序必不可少时方可适用 (*Blake v. the United Kingdom*, § 40)。

274. 第六条第一款也适用于非完全司法性但与司法机构的监督密切相关的程序。例如, 由两名公证员操作的非争议性的, 但需法院调整和同意的财产分割程序 (*Siegel v. France*, §§ 33-38)。公证程序持续的时间因此也被纳入诉讼期间。

275. 至于期间的终止, 一般而言包含整个诉讼持续的期间, 包括上诉程序 (*König v. Germany*, § 98 in fine) 并持续至最终决定做出之时 (*Poiss v. Austria*, § 50)。因此, “合理时间要求”适用于旨在解决纠纷的诉讼的各个阶段, 包括判决作出之后的阶段 (*Robins v. the United Kingdom*, §§ 28-29)。

276. 未计算诉讼持续期间, 任何法院做出的 判决的执行也被认为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 (*Martins Moreira v. Portugal*, § 44; *Silva Pontes v. Portugal*, § 33; *Di Pede v. Italy*, § 24)。知道诉讼中确认的权利变为现实时, 诉讼持续期间方停止计算 (*Estima Jorge v. Portugal*, §§ 36-38)。

277. 若宪法法院的决定能够影响普通法院处理争议的结果, 即使其对实体内容不具有管辖权, 其审理的诉讼程序也应被纳入考虑 (*Deumeland v. Germany*, § 77; *Süßmann v. Germany* [GC], § 39; *Pammel v. Germany*, §§ 51-57)。但是, 对普通法院而言, 不得用

此种方法理解在合理时间内审理案件的义务 (*Süßmann v. Germany* [GC], § 56; *Oršuš and Others v. Croatia* [GC], § 109)。

278. 最后，关于民事诉讼中第三方的干涉，需注意如下区别：若申请者自身对本国诉讼程序进行干涉，则应当考量的时间从干涉发生之日起算，若申请者声明了其作为继承人继续进行诉讼的意愿，则其可对诉讼全过程提出抗议 (*Scordino v. Italy (no. 1)*, § 220)。

(b) 对合理时间要求的评定

(i) 原则

279. 在特定案件中进行评定：第六条第一款范围内诉讼事件的合理性必须在个案中基于具体情形予以评定 (*Frydlender v. France* [GC], § 43)，这也可能需要整体性衡量 (*Obermeier v. Austria*, § 72; *Comingersoll S.A. v. Portugal* [GC], § 23)。

280. 必须考察诉讼整个过程 (*König v. Germany*, § 98 in fine)。

- 尽管不同的延迟本身可能并不导致任何问题，但当对其进行整体考量时，他们可能导致合理时间要求被违反 (*Deumeland v. Germany*, § 90)。
- 在诉讼特定阶段的延迟可以被允许，前提是诉讼期间整体上未超过合理范围 (*Pretto and Others v. Italy*, § 37)。
- “诉讼长期停滞且...”切无任何解释的情形是不被允许的 (*Beumartin v. France*, § 33)。

281. 第六条第一款对于诉前程序的实用性要基于特定条件是否被满足 *Micallef v. Malta* [GC], §§ 83-86)。²¹

282. 将问题转交 CJEC/CJEU 进行初步处理的程序的时间不被考虑²² (*Pafitis and Others v. Greece*, § 95)。

(ii) 标准

283. 诉讼持续时间的合理性必须基于本法院判例法中确立的如下标准进行评定：案件复杂性，申请者以及相关权力机构的行为以及申请人在争议中受到威胁的权利 (*Comingersoll S.A. v. Portugal* [GC]; *Frydlender v. France* [GC], § 43; *Sürmeli v. Germany* [GC], § 128)。

▪ 案件复杂性

284. 案件的复杂性包含具有实施层面和法律层面 (*Katte Klitsche de la Grange v. Italy*, § 55; *Papachelas v. Greece* [GC] § 39)。例如，其可能源于案件由多方参与 (*H. v. the United Kingdom*, § 72) 或者源于所获证据的不同形式 (*Humen v. Poland* [GC] § 63)。

285. 国内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可说明其持续时间 (*Tierce v. San Marino*, § 31)。

▪ 申请人的行为

286. 第六条第一款中，申请人并未被要求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也不得因未充分利用可行的本国救济手段而承担责任 (*Erkner and Hofauer v. Austria*, § 68)。

²¹. 参见“范围”部分

²².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87. 相关当事人仅被要求在与其相关的诉讼阶段尽到勤勉职责，不得使用拖延战术，并利用本国法提供的手段来缩短诉讼时间 (*Unión Alimentaria Sanders S.A. v. Spain*, § 35)。

288. 申请人的行为构成不可归于被诉国家的客观事实，且在确定是否超过第六条第一款提到的合理时间时，该行为必须被纳入考虑 (*Poiss v. Austria*, § 57; *Wiesinger v. Austria*, § 57; *Humen v. Poland* [GC], § 66)。申请人的行为本身不得作为诉讼中进展缓慢的理由。

289. 与申请人行为有关的例子：

- 参与方提交其意见时行动迟缓，构成诉讼进程缓慢的关键原因 (*Vernillo v. France*, § 34);
- 频繁更换律师 (*König v. Germany*, § 103);
- 影响诉讼进行的请求或疏漏 (*Acquaviva v. France*, § 61);
- 达成友好协议的尝试 (*Pizzetti v. Italy* § 18; *Laino v. Italy* [GC] § 22);
- 欠缺管辖权的法院错误进行的诉讼 (*Beaumartin v. France*, § 33)。

290. 尽管本国权力机构不应对被告行为负责，但诉讼一方所使用的拖延战术并不能免除国家确保诉讼在合理时间内进行的义务 (*Mincheva v. Bulgaria*, § 68)。

▪ 相关国家机关的行为

291. 仅当迟延可归责于国家时，此迟延造成的对“合理时间要求”的违反才具有正当性 (*Buchholz v. Germany*, § 49; *Papageorgiou v. Greece*, § 40; *Humen v. Poland* [GC], § 66)。国家对其所有机构负责：不仅是司法机关，还包括所有公共机构 (*Martins Moreira v. Portugal*, § 60)。

292. 即使在实行由诉讼参与方启动诉讼这一原则的法律体系中，参与方的态度也不能免除法院第六条第一款所要求的确保诉讼迅速而有效进行的义务 (*Pafitis and Others v. Greece*, § 93; *Tierce v. San Marino*, § 31; *Sürmeli v. Germany* [GC], § 129)。

293. 这也适用于诉讼中需要专家的配合的情形：法院负有对案件进行准备并使诉讼快速进行的责任 (*Capuano v. Italy*, §§ 30-31; *Versini v. France*, § 29; *Sürmeli v. Germany* [GC], § 129)。

294. 由缔约国自身架构其司法体系从而使其法院能够保障所有人在合理时间内获得对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最终决定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 183, and *Sürmeli v. Germany* [GC], § 129)。

295. 尽管这项义务也适用于宪法法院，但适用方式不同于普通法院。宪法法院所具有的宪法卫士的角色使得其十分必要在有时考虑除案件被提交的时间顺序之外的其他因素，诸如案件性质、其政治和社会重要性（比较 *Süßmann v. Germany* [GC], §§ 56-58; *Voggenreiter v. Germany*, §§ 51-52; *Oršuš and Others v. Croatia* [GC], § 109)。进一步而言，尽管第六条第一款要求司法程序快速且有效进行，但其也强调司法公正这一基本原则 (*Von Maltzan and Others v. Germany* (裁定) [GC], § 132)。但是，长期的超负荷也不能赋予诉讼超时正当性 (*Probstmeier v. Germany*, § 64)。

296. 由于成员国负有架构其司法体系从而保障在合理时间内获得司法决定的权利，因此超额的工作量不得作为考虑因素 (*Vocaturò v. Italy*, § 17; *Cappello v. Italy*, § 17)。但是，临时的业务积压并不导致国家一方的责任，前提是已采取合理及时的补救措施以处理此类特殊情形 (*Buchholz v. Germany*, § 51)。可被视为临时性权宜手段的方式，包括采用特定顺序处理案件，不禁基于案件被提交的日期，还基于紧急和重要程度，

以及当事人面临的威胁。但是，如果此类事项被延长且成为了一个组织结构，则此类方式便不再满足要求，国家必须确保有效措施的采纳 (*Zimmermann and Steiner v. Switzerland*, § 29; *Guincho v. Portugal*, § 40)。这种积压成为普遍情形的事实也不能使诉讼超时具备正当性 (*Unión Alimentaria Sanders S.A. v. Spain*, § 40)。

297. 进一步而言，旨在加快案件审查的改革的引入不能使迟延具备正当性，因为国家有义务通过能避免延长待审案件审查时间的方式，来安排这些措施的生效和实施 (*Fisanotti v. Italy*, § 22)。要衡量成员国为了避免或解决超时诉讼而采用的救济手段的是否适当，必须结合本法院所确立的各项原则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 178 et seq. and 223)。

298. 在存在过多关于申请人精神状态的司法行为的案件中，国家应对案件审理违反合理时间要求负责。此案中，尽管已有 5 份报告表明申请人意识正常，且其对两份监护申请不予理睬，本国法院仍持续对申请人精神状况予以怀疑；更重要的是，这项诉讼持续时间超过九年 (*Bock v. Germany*, § 47)。

299. 一个法庭成员罢工并不免除缔约国遵守“合理时间”要求的义务；尽管如此，在确定此要求是否被遵守时，国家所做出的旨在减少迟延的努力应当被考虑。 (*Papageorgiou v. Greece*, § 47)。

300. 频繁更换法官而减缓诉讼进程的，国家等要对违反合理时间要求负责，因为国家有义务合理组织其司法行政机构 (*Lechner and Hess v. Austria*, § 58)。

· 争议中面临威胁的权利

301. 基于其自身性质而要求被快速有效审理的案件类型示例如下：

- 有关公民地位和公民能力的案件中要求特殊的勤勉 (*Bock v. Germany*, § 49; *Laino v. Italy* [GC], § 18; *Mikulić v. Croatia*, § 44);
- 儿童拘留案件必须被快速处理 (*Hokkanen v. Finland*, § 72; *Niederböster v. Germany*, § 39), 尤其是在时间流逝会对亲子关系造成不可恢复的影响时 (*Tsikakis v. Germany*, §§ 64 & 68) – 类似的，关于家长责任和合同权利的案件也需要被快速审理 (*Paulsen-Medalen and Svensson v. Sweden*, § 39; *Laino v. Italy* [GC], § 22);
- 职业纠纷基于其性质需要被快速审理 (*Vocaturro v. Italy*, § 17) – 无论争议事项是自由职业 (*Thlimmenos v. Greece* [GC], §§ 60 & 62), 申请人的全部职业生计 (*König v. Germany*, § 111), 申请人职业的持续性 (*Garcia v. France*, § 14), 对解雇的上诉 (*Buchholz v. Germany*, § 52; *Frydlender v. France* [GC], § 45), 申请人被停职 (*Obermeier v. Austria*, § 72), 调任 (*Sartory v. France*, § 34) 或被任命 (*Ruotolo v. Italy*, § 117), 或主张的数量对申请人具有突出重要性 (*Doustaly v. France*, § 48), 这类中也包括养老金争议 (*Borgese v. Italy*, § 18);
- 在申请人遭受绝症并丧失生活信心的案件中，权力机构必须及其勤勉 *X. v. France*, § 47; *A. and Others v. Denmark*, §§ 78-81。

302. 其他先例

- 在审查个人声称其遭受警察暴力迫害的控诉时，相关司法机关必须尤其尽职和勤勉 (*Caloc v. France*, § 120);

- 在申请人以残疾保障金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案件中，申请人由于健康恶化而要求增加保障金的诉讼程序对其而言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此国内机构必须在此案中表现出特殊的勤勉 (*Mocié v. France*, § 22);
- 在遭受物理伤害且作为民事主体提起诉讼时已年逾 65 岁的申请人提出的赔偿诉讼案件中，面临危害的权利要求国内机构表现出特殊的勤勉 (*Codarcea v. Romania*, § 89)。
- 申请人面临危害的权利也可以是受教育的权利 (*Oršuš and Others v. Croatia* [GC], § 109)。

相关判决和裁定列表

本法院的判决和决定均以英语和法语这两种工作语言发布。本报告中的判决和决定的超级链接连接到该文件的原始文本。读者可访问本法院 www.echr.coe.int 的 HUDOC 数据库来获取这些判决和决定的文本。HUDOC 数据库也包含诸多重要案件的 20 余种非工作语言译本，以及指向由第三方提供的近百个判例的网络链接。

A.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5373/97, ECHR 2002-X
Acimovic v. Croatia, no. 61237/00, ECHR 2003-XI
Acquaviva v. France, 21 November 1995, Series A no. 333-A
Aerts v. Belgium, 30 Jul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
Agrokompleks v. Ukraine, no. 23465/03, 6 October 2011
Air Canada v. the United Kingdom, 5 May 1995, Series A no. 316-A
Airey v. Ireland, 9 October 1979, series A no. 32
Aït-Mouhoub v. France, 28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I
Aksoy v. Turkey, 18 Dec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Alaverdyan v. Armenia, (裁定), no. 4523/04, 24 August 2010
Al-Ads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35763/97, ECHR 2001-XI
Alatulkkila and Others v. Finland, no. 33538/96, 28 July 2005
Albert and Le Compte v. Belgium, 10 February 1983, Series A no. 58
Albu and Others v. Romania, nos. 34796/09 and 60 others, 10 May 2012
Alexandre v. Portugal, no. 33197/09, 20 November 2012
Allan Jacobsson v. Sweden (no. 2), 19 Februar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
Amat-G Ltd and Mebaghishvili v. Georgia, no. 2507/03, ECHR 2005-VIII
Anagnostopoulos and Others v. Greece, no. 39374/98, ECHR 2000-XI
Anđelković v. Serbia, no. 1401/08, 9 April 2013
Andersson v. Sweden, no. 17202/04, 7 December 2010
Andret and Others v. France (裁定), no. 1956/02, 25 May 2004
Andronicou and Constantinou v. Cyprus, 9 Octo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
Andronikashvili v. Georgia (裁定), no. 9297/08, 22 June 2010
Ankerl v. Switzerland, 23 Octo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
Annoni di Gussola and Others v. France, nos. 31819/96 and 33293/96, ECHR 2000-XI
APEH Üldözötteinek Szövetsége and Others v. Hungary, no. 32367/96, ECHR 2000-X
Apostol v. Georgia, no. 40765/02, ECHR 2006-XIV
Argyrou and Others v. Greece, no. 10468/04, 15 January 2009
Arvanitakis v. France (裁定), no. 46275/99, ECHR 2000-XII
Ashingdane v. the United Kingdom, 28 May 1985, Series A no. 93
Asnar v. France (no. 2), no. 12316/04, 18 October 2007
Atanasovski v.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no. 36815/03, 14 January 2010
Athanassoglou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GC], no. 27644/95, ECHR 2000-IV
Augusto v. France, n° 71665/01, 11 January 2007
Axen v. Germany, 8 December 1983, Series A no. 72
B. and P. v. the United Kingdom, nos. 36337/97 and 35974/97, ECHR 2001-III
Bakan v. Turkey, no. 50939/99, 12 June 2007

- Balmer-Schafroth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26 August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V
- Barać and Others v. Montenegro*, no. 47974/06, 13 December 2011
- Beaumartin v. France*, 24 November 1994, Series A no. 296-B
- Beer v. Austria*, no. 30428/96, 6 February 2001
- Beian v. Romania (No. 1)*, no. 30658/05, ECHR 2007-V (extracts)
- Beles and others v. Czech Republic*, no. 47273/99, ECHR 2002-IX
- Bellet v. France*, 4 December 1995, Series A no. 333-B
- Beneficio Cappella Paolini v. San Marino*, no. 40786/98, ECHR 2004-VIII (extracts)
- Bentham v. the Netherlands*, 23 October 1985, Series A no. 97
- Berger v. France*, no. 48221/99, ECHR 2002-X (extracts)
- Bertuzzi v. France*, no. 36378/97, ECHR 2003-III
- Bochan v. Ukraine*, no. 7577/02, 3 May 2007
- Bock v. Germany*, 29 March 1989, Series A no. 150
- Borgese v. Italy*, 26 February 1992, Series A no. 228-B
- Bottazzi v. Italy* [GC], no. 34884/97, ECHR 1999-V
- Bouilloc v. France*, no. 34489/03, 28 November 2006
- Boulois v. Luxembourg* [GC], no. 37575/04, ECHR 2012
- Blake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68890/01, 26 September 2006
- Blucher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58580/00, 11 January 2005
-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Ltd v. the Netherlands*, 20 November 1995, Series A no. 331
- Brualla Gomez de la Torre v. Spain*, 19 Decem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II
- Brudnicka and Others v. Poland*, no. 54723/00, ECHR 2005-II
- Brumarescu v. Romania*, [GC], no. 28342/95, ECHR 1999-VII
- Bryan v. the United Kingdom*, 22 November 1995, Series A no. 335-A
- Buchholz v. Germany*, 6 May 1981, Series A no. 42
- Bufferne v. France*, (裁定), no. 54367/00, ECHR 2002-III (extracts)
- Buj v. Croatia*, no. 24661/02, 1 June 2006
- Burdov v. Russia*, no. 59498/00, ECHR 2002-III
- Burdov v. Russia (no. 2)*, no. 33509/04, ECHR 2009
- Burg and others v. France* (裁定), no. 34763/02, 28 January 2003
- Buscarini v. San Marino* (裁定), no. 31657/96, 4 May 2000
- Buscemi v. Italy*, no. 29569/95, ECHR 1999-VI
- Buzescu v. Romania*, no. 61302/00, 24 May 2005
- C.G.I.L. and Cofferati (no. 2) v. Italy*, no. 2/08, 6 April 2010
- Caloc v. France*, no. 33951/96, ECHR 2000-IX
- Canela Santiago v. Spain*, (裁定), no. 60350/00, 4 October 2001
- Cañete de Goñi v. Spain*, no. 55782/00, ECHR 2002-VIII
- Cappello v. Italy*, 27 February 1992, series A no. 230-F
- Capuano v. Italy*, 25 June 1987, Series A no. 119
- Central Mediterran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v. Malta (no. 2)*, no. 18544/08, 22 November 2011
- Centro Europa 7 S.R.L. and di Stefano v. Italy* [GC], no. 38433/09, ECHR 2012
- Chapman v. Belgium*, (裁定), no. 39619/06, 5 March 2013
- Chaudet v. France*, no. 49037/06, 29 October 2009
- Chevrol v. France*, no. 49636/99, ECHR 2003-III
- Ciprova v. the Czech Republic* (裁定), no. 33273/03, 22 March 2005

Clarke v. United Kingdom (裁定) n°23695/02, ECHR 2005-X (extracts)
Clinique des Acacias and Others v. France, nos. 65399/01, 65406/01, 65405/01 and 65407/01, 13 October 2005
Codarcea v. Romania, no. 31675/04, 2 June 2009
Collectif national d'information et d'opposition à l'usine Melox – Collectif Stop Melox et Mox v. France (裁定), no.75218/01, 28 March 2006
Comingersoll S.A. v. Portugal, no. 35382/97, ECHR 2000-IV
Cooper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48843/99, ECHR 2003-XII
Coöperatieve Producentenorganisatie van de Nederlandse Kokkelvisserij U.A. v. Netherlands (裁定), no. 13645/05, ECHR 2009
Cordova v. Italy (no. 1), no. 40877/98, ECHR 2003-I
Cordova v. Italy (no. 2), no. 45649/99, ECHR 2003-I (extracts)
Crompto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2509/05, 27 October 2009
Cubănit v. Romania (裁定), no. 31510/02, 4 January 2007
Cudak v. Lithuania [GC], no. 15869/02, 23 March 2010, ECHR 2010
Cyprus v. Turkey, [GC], no. 25781/94, ECHR 2001-IV
DMD Group, A.S., v. Slovakia, no. 19334/03, 5 October 2010
Dağtekin and Others v. Turkey, no. 70516/01, 13 December 2007
Dalea v. France (裁定), no. 964/07, 2 February 2010
De Geouffre de la Pradelle v. France, 16 December 1992, Series A no. 253-B
De Haan v. the Netherlands, 26 August 1997, Reports 1997-IV
De Haes and Gijssels v. Belgium, 24 Februar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
De Moor v. Belgium, 23 June 1994, Series A no. 292-A
Del Sol v. France, no. 46800/99, ECHR 2002-II
Deumeland v. Germany, 29 May 1986, Series A no. 100
Deweert v. Belgium, 27 February 1980, Series A no. 35
Di Pede v. Italy, 26 Sept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V
Diennet v. France, no. 18160/91, 26 September 1995
Dolca v. Romania (裁定), no. 59282/11, 62398/11 63211/11, 4 September 2012
Dombo Beheer B.V. v. the Netherlands, 27 October 1993, Series A no. 274
Donadzé v. Georgia, no. 74644/01, 7 March 2006
Döry v. Sweden, no. 28394/95, 12 November 2002
Dotta v. Italy (裁定), 38399/97, 7 September 1999
Doustaly v. France, 23 April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Driza v. Albania, no. 33771/02, ECHR 2007-V (extracts)
Ducret v. France, no. 40191/02, 12 June 2007
Dulaurans v. France, no. 34553/97, 21 March 2000
EEG-Slachthuis Verbist Izegem v. Belgium (裁定), no. 60559/00, ECHR 2005-XII
Eisenstecken v. Austria, no. 29477/95, ECHR 2000-X
Elsholz v. Germany [GC], no. 25735/94, ECHR 2000-VIII
Ellès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no. 12573/06, 16 December 2010
Emesa Sugar N.V. v. the Netherlands (裁定), no. 62023/00, 13 January 2005
Emine Araç v. Turkey, no. 9907/02, 23 September 2008
Erkner and Hofbauer v. Austria, 23 April 1987, series A n° 117
Ernst and Others v. Belgium, no. 33400/96, 15 July 2003
Essaadi v. France, no. 49384/99, 26 February 2002
Estima Jorge v. Portugal, 21 April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Eternit v. France (裁定), no. 20041/10, 27 March 2012

Exel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48962/99, 5 July 2005
Fazliyski v. Bulgaria, no. 40908/05, 16 April 2013
Farange S.A. v. France (裁定), no. 77575/01, 14 September 2004
Fayed v. the United Kingdom, 21 September 1994, Series A no. 294-B
Feldbrugge v. the Netherlands, 29 May 1986, Series A no. 99
Ferrazzini v. Italy [GC], no. 44759/98, ECHR 2001-VII
Ferreira Alves v. Portugal (No. 3), n° 25053/05, 21 June 2007
Fisanotti v. Italy, 23 April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Fischer v. Austria, 26 April 1995, Series A no. 312
Fiume v. Italy, no. 20774/05, 30 June 2009
Flux v. Moldova (no. 2), no. 31001/03, 3 July 2007
Fociac v. Romania, no. 2577/02, 3 February 2005
Fogart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37112/97, ECHR 2001-XI (extracts)
Forrer-Niedenthal v. Germany, no. 47316/99, 20 February 2003
Fuklev v. Ukraine, no. 71186/01, 7 June 2005
Fredin v. Sweden (no. 2), 23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 283-A
Fretté v. France, no. 36515/97, ECHR 2002-I
Frimu and Others v. Romania (裁定), 45312/11, 45581/11, 45583/11, 13 November 2012
Frydlender v. France, [GC], no. 30979/96, ECHR 2000-VII
Ganci v. Italy, no. 41576/98, ECHR 2003-XI
Garcia Manibardo v. Spain, no. 38695/97, ECHR 2000-II
García Ruiz v. Spain [GC], no. 30544/96, ECHR 1999-I
Gaspari v. Slovenia, no. 21055/03, 21 July 2009
Gautrin and Others v. France, 20 May 1998, *Reports* 1998-III
Georgiadis v. Greece, 29 Ma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I
Geraguyn Khorhurd Patgamavorakan Akumb v. Armenia (裁定), no. 11721/04, 14 April 2009
G.L. and S.L. v. France, (裁定), no. 58811/00, ECHR 2003-III (extracts)
Gnahoré v. France, no. 40031/98, ECHR 2000-IX
Göç v. Turkey [GC], no. 36590/97, ECHR-2002-V
Golder v. the United Kingdom, 21 February 1975, series A no. 18
Golubović v. Croatia, no. 43947/10, 27 November 2012
Gorou v. Greece (no. 2) [GC], no. 12686/03, 20 March 2009
Gorraiz Lizarraga and Others v. Spain, no. 62543/00, ECHR 2004-III
Granos Organicos Nacionales S.A. v. German, no. 19508/07, 22 March 2012
Gülmez v. Turkey, no. 16330/02, 20 May 2008
Guigue and SGEN-CFDT v. France (裁定), no. 59821/00, ECHR 2004-I
Guincho v. Portugal, 10 July 1984, Series A no. 81
Gurov v. Moldova, no. 36455/02, 11 July 2006
Gutfreund v. France no. 45681/99, ECHR 2003-VII
H. v. Belgium, 30 November 1987, Series A no. 127-B
H. v. France, 24 October 1989, Series A no. 162-A
H. v. the United Kingdom, 8 July 1987, Series A no. 120
Håkansson and Sturesson v. Sweden, 21 February 1990, series A no 171-A
Helle v. Finland, 19 December 1997, *Reports* 1997-VIII
Helmers v. Sweden, 29 October 1991, series A no 212-A
Hentrich v. France, 22 September 1994, series A no. 296-A
Hesse-Anger v. Germany, (裁定) no. 45835/99, 16 May 2002
Hiro Balani v. Spain, 9 December 1994, Series A no. 303-B

Hirvisaari v. Finland, no. 49684/99, 27 September 2001
Hokkanen v. Finland, 23 September 1994, series A no 299-A
Holding and Barnes plc v. the United Kingdom (裁定), no. 2352/02, ECHR 2002-IV
Hornsby v. Greece, 19 March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
Hotter v. Austria (裁定), no. 18206/06, 7 October 2010
Hudakova and others v. Slovakia, n° 23083/05, 27 avril 2010
Humen v. Poland, [GC], no. 26614/95, 15 October 1999
Hurter v. Switzerland, no. 53146/99, 15 December 2005
I.T.C. Ltd v. Malta, (裁定), no. 2629/06, 11 December 2007
Immeubles Groupe Kosser v. France, no. 38748/97, 21 March 2002
Immobiliare Saffi v. Italy, [GC], no. 22774/93, ECHR 1999-V
Indra v. Slovakia, no. 46845/99, 1 February 2005
Ivan Atanasov v. Bulgaria, no. 12853/03, 2 December 2010
Jahnke and Lenoble v. France, (裁定), no. 40490/98, ECHR 2000-IX
James and others v. United Kingdom, 21 February 1986, Series A no. 98
Jurisc and Collegium Mehrerau v. Austria, no. 62539/00, 27 July 2006
K.D.B. v. the Netherlands, 27 March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
K.S. v. Finland, no. 29346/95, 31 May 2001
Kakamoukas and Others v. Greece [GC], no. 38311/02, 15 February 2008
Kalogeropoulou and Others v. Greece and Germany, (裁定), no. 59021/00, ECHR 2002-X
Katte Klitsche de la Grange v. Italy, 27 October 1994, series A n° 293-B
Kerojärvi v. Finland, 19 July 1995, Series A no. 322
Kings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35605/97, ECHR 2002-IV
Kleyn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GC], nos. 39343/98, 39651/98, 43147/98 and 46664/99, ECHR 2003-VI
Kök v. Turkey, no. 1855/02, 19 October 2006
König v. Germany, 28 June 1978, series A no. 27
Kraska v. Switzerland, 19 April 1993, Series A no. 254-B
Krčmář and Others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35376/97, 3 March 2000
Kress v. France [GC], no. 39594/98, ECHR 2001-VI
Kreuz v. Poland (no. 1) no. 28249/95, ECHR 2001-VI
Kübler v. Germany, no. 32715/06, 13 January 2011
Kukkonen v. Finland no. 2, no. 47628/06, 13 January 2009
Kutic c. Croatie, no. 48778/99, ECHR 2002-II
Kyrtatos v. Greece, no. 41666/98, ECHR 2003-VI (extracts)
L. v. United Kingdom (裁定), no. 34222/96, ECHR 1999-VI
L'Erablière A.S.B.L. v. Belgium, no. 49230/07, ECHR 2009
Laidin v. France (no. 2), no. 39282/98, 7 January 2003
Laino v. Italy [GC], no. 33158/96, ECHR 1999-I
Lamanna v. Austria, no. 28923/95, 10 July 2001
Langborger v. Sweden, 22 June 1989, Series A no. 155
Laskowska v. Poland, no. 77765/01, 13 March 2007
Lavents v. Latvia, no. 58442/00, 28 November 2002
Le Calvez v. France, 29 Jul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
Le Compte, Van Leuven and De Meyere v. Belgium, 23 June 1981, Series A no. 43
Lechner and Hess v. Austria, 23 April 1987, series A no. 118
Levages Prestations Services v. France, 23 Octo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
Libert v. Belgium, (裁定), no. 44734/98, 8 July 2004

Lithgow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8 July 1986, Series A no. 102
Lobo Machado v. Portugal, 20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
Loiseau v. France (裁定), no. 46809/99, ECHR 2003-XII
Lorenzetti v. Italy, no. 32075/09, 10 April 2012
Luka v. Romania, no. 34197/02, 21 July 2009
Lunari v. Italy, no. 21463/93, 11 January 2001
Lundevall v. Sweden, no. 38629/97, 12 November 2002
Luordo v. Italy, no. 32190/96, ECHR 2003-IX
Lupas and others v. Romania (no.1), nos. 1434/02, 35370/02 and 1385/03, ECHR 2006-XV
 (extracts)
Maaouia v. France [GC], no. 39652/98, ECHR 2000-X
Mackay and BBC Scot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10734/05, 7 December 2010
Majorana v. Italy, (裁定), no. 75117/01, 26 May 2005
Malhous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no. 33071/96, 12 July 2001
Mamatkulov and Askarov v. Turkey [GC], nos. 46827/99 and 46951/99, ECHR 2005-I
Manoilescu and Dobrescu v. Romania and Russia (裁定), no. 60861/00, ECHR 2005 VI
Mantovanelli v. France, 18 mars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
Markovic and Others v. Italy, no. 1398/03, ECHR 2006-XIV
Martinie v. France [GC], no. 58675/00, ECHR 2006-VI
Martins Moreira v. Portugal, 26 October 1988, series A n° 143,
Masson and Van Zon v. the Netherlands, 28 September 1995, Series A no. 327-A
Matheus v. France, no. 62740/00, 31 March 2005
McElhinney v. Ireland [GC], no. 31253/96, ECHR 2001-XI (extracts)
McGinley and Egan v. the United Kingdom, 9 June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II
McGonnell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28488/95, ECHR 2000-II
McMichael v. the United Kingdom, 24 February 1995, series A no. 307-B
McVicar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46311/99, ECHR 2002-III
Melis v. Greece, no. 30604/07, 22 July 2010
Melnyk v. Ukraine, no. 23436/03, 28 March 2006
Menchinskaya v. Russia, no. 42454/02, 15 January 2009
Mercieca and Others v. Malta, no. 21974/07, 14 June 2011
Merigaud v. France, 32976/04, 24 September 2009
Mežnarić v. Croatia, no. 71615/01, 15 July 2005
Micallef v. Malta [GC], no. 17056/06, ECHR 2009
Mihova v. Italy (裁定), no. 25000/07, 30 March 2010
Mikulić v. Croatia, no. 53176/99, ECHR 2002-I
Milatova v. Czech Republic, no. 61811/00, ECHR 2005-V
Miller v. Sweden, no. 55853/00, 8 February 2005
Mincheva v. Bulgaria, n° 21558/03, 2 September 2010
Miragall Escolano v. Spain, nos. 38366/97, 38688/97, 40777/98, 40843/98, 41015/98, 41400/98, 41446/98, 41484/98, 41487/98 and 41509/98, ECHR 2000-I
Mirolubovs and Others v. Latvia, no. 798/05, 15 September 2009
Mocié v. France, no. 46096/99, 8 April 2003
Moreira de Azevedo v. Portugal, 23 October 1990, Series A no. 189
Morel v. France, no. 34130/96, ECHR 2000-VI
Moroko v. Russia, no. 20937/07, 12 June 2008
Moser v. Austria, no 12643/02, 21 September 2006
Mosteanu and Others v. Romania, no. 33176/96, 26 November 2002
Musumeci v. Italy, no. 33695/96, 11 January 2005

- Mutimura v. France*, no. 46621/99, 8 June 2004
- National & Provincial Building Society, Leeds Permanent Building Society and Yorkshire Building Society v. the United Kingdom*, 23 Octo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I
- Nejdet Şahin and Perihan Şahin v. Turkey* [GC], no. 13279/05, 20 October 2011
- Nideröst-Huber v. Switzerland*, no. 18990/91, ECHR 1997-I
- Niederböster v. Germany*, no. 39547/98, 27 February 2003
- Nunes Dias v. Portugal* (裁定), nos. 2672/03 and 69829/01, ECHR 2003-IV
- Obermeier v. Austria*, 28 June 1990, Series A no. 179
- Oerlemans v. the Netherlands*, 27 November 1991, Series A no. 219
- OGIS-Institut Stanislas, OGEK Saint-Pie X and Blanche de Castille and Others v. France*, nos. 42219/98 and 54563/00, 27 May 2004
- Okyay and others v. Turkey*, no. 36220/97, ECHR 2005-VII
- Oleksandr Volkov v. Ukraine*, no. 21722/11, ECHR 2013
- Oleynikov v. Russia*, no. 36703/04, 14 March 2013
- Olsson v. Sweden (No. 1)*, 24 March 1988, series A no. 130
- Olujić v. Croatia*, no. 22330/05, 5 February 2009
- Organis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infirmiers libéraux (O.N.S.I.L.) v. France* (裁定), no. 39971/98, ECHR 2000-IX
- Oršuš and Others v. Croatia* [GC], no. 15766/03, 16 March 2010
- Ortenberg v. Austria*, 25 November 1994, Series A no. 295-B
- Osinger v. Austria*, no. 54645/00, 24 March 2005
- Osman v. the United Kingdom* 28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I
- Ouzounis and Others v. Greece*, no. 49144/99, 18 April 2002
- P., C. and 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56547/00, ECHR 2002-VI
- Pabla Ky v. Finland*, no. 47221/99, ECHR 2004-V
- Pafitis and Others v. Greece*, 26 Februar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
- Paksas v. Lithuania* [GC], no. 34932/04, 6 January 2011
- Pammel v. Germany*, 1 Jul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V
- Panjeheighalehei v. Denmark* (裁定), no. 11230/07, 13 October 2009
- Papachelas v. Greece*, [GC], no. 31423/96, ECHR 1999-II
- Papageorgiou v. Greece*, 22 Octo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
- Papon v. France* (裁定), no. 344/04, ECHR 2005-XI
- Parlov-Tkalčić v. Croatie*, no. 24810/06, 22 December 2009
- Paulsen-Medalen and Svensson v. Sweden*, 19 Februar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
- Pedro Ramos v. Switzerland*, no. 10111/06, 14 October 2010
- Pellegrin v. France* [GC], no. 28541/95, ECHR 1999-VIII
- Pellegrini v. Italy*, no. 30882/96, ECHR 2001-VIII
- Peñañiel Salgado v. Spain* (裁定), no. 65964/01, 16 April 2002
- Perez v. France* [GC], no. 47287/99, ECHR 2004-I
- Perez de Rada Cavanilles v. Spain*, 28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VIII
- Peruš v. Slovenia*, no. 35016/05, 27 September 2012
- Pescador Valero v. Spain*, no. 62435/00, ECHR 2003-VII
- Petko Petkov v. Bulgaria*, no. 2834/06, 19 February 2013
- Pétur Thór Sigurðn v. Iceland*, no. 39731/98, ECHR 2003-IV
- Philis v. Greece*, 27 August 1991, Series A no. 209

Philis v. Greece (No. 2), 27 June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V
Pierre-Bloch v. France, 21 Octo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
Pini and Others v. Romania, nos. 78028/01 and 78030/01, ECHR 2004-V (extracts)
Pizzetti v. Italy, 26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7-C
Platakou v. Greece, no. 38460/97, ECHR 2001-I
Pocius v. Lithuania, no. 35601/04, 6 July 2010
Podbielski and PPU PolPure v. Poland, no. 39199/98, 26 July 2005
Poiss v. Austria, 23 April 1987, series A n^o 117
Potocka and Others v. Poland, no. 33776/96, ECHR 2001-X
Preda and Dardari v. Italy (裁定), nos. 28160/95 and 28382/95, ECHR 1999-III
Pretto and Others v. Italy, 8 December 1983, Series A no. 71
Pridatchenko and Others v. Russia, nos. 2191/03, 3104/03, 16094/03 and 24486/03, 21 June 2007
Prince Hans-Adam II of Liechtenstein v. Germany, [GC], no. 42527/98, ECHR 2001-VIII
Probstmeier v. Germany, 1 Jul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V
Procola v. Luxembourg, 28 September 1995, Series A no. 326
Prodan v. Moldova, no. 49806/99, ECHR 2004-III (extracts)
Puolitaival and Pirttiaho v. Finland, no. 54857/00, 23 November 2004
R.P.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8245/08, 9 October 2012
Raylyan v. Russia, no. 22000/03, 15 February 2007
Refah Partisi (The Welfare Party) and Others v. Turkey (裁定), nos. 41340/98, 41342/98, 41343/98 and 41344/98, 3 October 2000
Reuther v. Germany (裁定), no. 74789/01, ECHR 2003-IX
Revel and Mora v. France (裁定), no. 171/03, 15 November 2005
Ringeisen v. Austria, 16 July 1971, Series A no. 13
Robin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22410/93, 23 September 1997
Roche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32555/96, ECHR 2005-X
Rolf Gustafson v. Sweden, 1 Jul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V
Romańczyk v. France, no. 7618/05, 18 November 2010
RTBF v. Belgium, 50084/06, 29 March 2011
Ruianu v. Romania, no. 34647/97, 17 June 2003
Ruiz-Mateos v. Spain, 23 June 1993, series A no. 262
Ruiz Torija v. Spain, 9 December 1994, Series A no. 303-A
Ruotolo v. Italy, 27 February 1992, Series A no. 230-D
Ryabykh v. Russia, no. 52854/99, ECHR 2003-IX
Ryakib Biryukov v. Russia, no. 14810/02, ECHR 2008
Sabeh El Leil v. France [GC], no. 34869/05, 29 June 2011
Sabin Popescu v. Romania, no. 48102/99, 2 March 2004
Sablon v. Belgium, no. 36445/97, 10 April 2001
Saccoccia v. Austria, (裁定), no. 69917/01, 5 July 2007
Saccoccia v. Austria, no. 69917/01, 18 December 2008
Sacilor-Lormines v. France, no. 65411/01, ECHR 2006-XIII
Sakellaropoulos v. Greece (dec), no. 38110/08, 6 January 2011
Salesi v. Italy, 26 February 1993, Series A no. 257-E
Salomonsson v. Sweden, no. 38978/97, 12 November 2002
Sâmbata Bihor Greco-Catholic Parish v. Romania, no. 48107/99, 12 January 2010
San Leonard Band Club v. Malta, no. 77562/01, ECHR 2004-IX
Sanglier v. France, no. 50342/99, 27 May 2003
Santambrogio v. Italy, no. 61945/00, 21 September 2004

- Santos Pinto v. Portugal*, no. 39005/04, 20 May 2008
- Saoud v. France*, no. 9375/02, 9 October 2007
- Sara Lind Eggertsdottir v. Iceland*, no. 31930/04, 5 July 2007
- Sartory v. France*, no. 40589/07, 24 September 2009
- Savino and Others v. Italy*, nos. 17214/05, 20329/05 and 42113/04, 28 April 2009
- Schouten and Meldrum v. the Netherlands*, 9 December 1994, Series A no. 304
- Schuler-Zraggen v. Switzerland*, 24 June 1993, Series A no. 263
- Scordino v. Italy (no. 1)* [GC], no. 36813/97, ECHR 2006-V
- Sdruzeni Jihoceske Matky v. the Czech Republic* (裁定), no 19101/03, 10 July 2006
- Siałkowska v. Poland*, no. 8932/05, 22 March 2007
- Siegel v. France*, no. 36350/97, ECHR 2000-XII
- Sigalas v. Greece*, no. 19754/02, 22 September 2005
- Sigma Radio Television Ltd v. Cyprus*, nos. 32181/04 and 35122/05, 21 July 2011
- Šikić v. Croatia*, no. 9143/08, 15 July 2010
- Silva Pontes v. Portugal*, 23 March 1994, series A n° 286-A
- Skorobogatykh v. Russia* (裁定), no. 37966/02, 8 June 2006
- Smirnov v. Russia* (裁定), no. 14085/04, 6 July 2006
- Société anonyme d'habitations à loyers modérés terre et famille v. France* (裁定)
n° 62033/00, 17 February 2004
- Société anonyme Sotiris and Nikos Koutras ATTEE v. Greece*, no. 39442/98, ECHR 2000-XII
- Sokurenko and Strygun v. Ukraine*, nos. 29458/04 and 29465/04, 20 July 2006
- Sovtransavto Holding v. Ukraine*, no. 48553/99, ECHR 2002-VII
- Speil v. Austria* (裁定), no. 42057/98, 5 September 2002
- Sporrong and Lönnroth v. Sweden*, 23 September 1982, Series A no. 52
- Sramek v. Austria*, no. 8790/79, 22 October 1984
- Stanev v. Bulgaria* [GC], no. 36760/06, ECHR 2012
- Stankiewicz v. Poland*, no. 46917/99, ECHR 2006-VI
- Staroszczyk v. Poland*, no. 59519/00, 22 March 2007
- Steel and Morris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68416/01, ECHR 2005-II
- Stegarescu and Bahrin v. Portugal*, no. 46194/06, 6 April 2010
- Stepinska v. France*, no. 1814/02, 15 June 2004
- Storck v. Germany*, no. 61603/00, ECHR 2005-V
- Stran Greek Refineries and Stratis Andreadis v. Greece*, 9 December 1994, Series A no. 301-B
- Stubbings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22 Octo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V
- Suda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1643/06, 28 October 2010
- Sukiüt v. Turkey* (裁定), no. 59773/00, 11 September 2007
- Suominen v. Finland*, no. 37801/97, 1 July 2003
- Sürmeli v. Germany*, [GC], no. 75529/01, ECHR 2006-VII
- Süßmann v. Germany* [GC], 16 Sept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V
- Švarc and Kavnik v. Slovenia*, no. 75617/01, 8 February 2007
- Syngelidis v. Greece*, no. 24895/07, 11 February 2010
- Szücs v. Austria*, 24 Novem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I
- Tabor v. Poland*, no. 12825/02, 27 June 2006
- Taşkın and Others v. Turkey*, n° 46117/99, ECHR 2004-X
- Tatishvili v. Russia*, no. 1509/02, ECHR 2007-I

- Terra Woningen B.V. v. the Netherlands*, 17 Dec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I
- Teteriny v. Russia*, no. 11931/03, 30 June 2005
- The Holy Monasteries v. Greece*, 9 December 1994, Series A no. 301-A
- Thlimmenos v. Greece* [GC], no. 34369/97, ECHR 2000-IV
- Tiemann v. France and Germany* (裁定), nos. 47457/99 and 47458/99, ECHR 2000-IV
- Tierce v. San Marino*, no. 69700/01, ECHR 2003-VII
- Tinnelly & Sons Ltd and Others and McElduff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10 July 1998,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8-IV
- Tocono and Profesorii Prometeiști v. Moldova*, no. 32263/03, 26 June 2007
- Tolstoy Miloslavsky v. the United Kingdom*, 13 July 1995, Series A no. 316-B
- Torri v. Italy*, 1 July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V
- Toziczka v. Poland*, no. 29995/08, 24 July 2012
- Tre Traktörer Aktiebolag v. Sweden*, 7 July 1989, Series A no. 159
- Tregubenko v. Ukraine*, no. 61333/00, 2 November 2004
- Treska v. Albania and Italy*, (裁定), no. 26937/04, ECHR 2006-XI (extracts)
- Tsfayo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60860/00, 14 November 2006
- Tsikakis v. Germany*, no. 1521/06, 10 February 2011
- Turczanik v. Poland*, no. 38064/97, ECHR 2005-VI
- Tuziński v. Poland*, (dec) 40140/98, 30 March 1999
- Uçar v. Turkey* (裁定), no. 12960/05, 29 September 2009
- Ullens de Schooten and Rezabek v. Belgium*, nos. 3989/07 and 38353/07, 20 September 2011
- Ulyanov v. Ukraine* (裁定), no. 16472/04, 5 October 2010
- Unédic v. France*, no. 20153/04, 18 December 2008
- Unión Alimentaria Sanders S.A. v. Spain*, 7 July 1989, Series A no. 157
- Užkauskas v. Lithuania*, no. 16965/04, 6 July 2010
- Valová and Others v. Slovakia*, no. 44925/99, 1 June 2004
- Van de Hurk v. the Netherlands*, 19 April 1994, Series A no. 288
- Van Droogenbroeck v. Belgium*, 24 June 1982, Series A no. 50
- Van Orshoven v. Belgium*, 25 June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III
- Varela Assalino v. Portugal* (裁定), no. 64336/01, 25 April 2002
- Vasilchenko v. Russia*, no. 34784/02, 23 September 2010
- Verein gegen Tierfabriken Schweiz (VgT) v. Switzerland (no. 2)* no.32772/02, 4 October 2007
- Verlagsgruppe News GmbH v. Austria* (裁定), no. 62763/00, 16 January 2003
- Vermeulen v. Belgium*, 20 February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I
- Vernillo v. France*, 20 February 1991, Series A no. 198
- Versini v. France*, no. 40096/98, 10 July 2001
- Vilho Eskelinen and Others v. Finland* [GC], no. 63235/00, ECHR 2007-II
- Vocaturò v. Italy*, 24 May 1991, series A no. 206-C
- Voggenreiter v. Germany*, no. 47169/99, ECHR 2004-I (extracts))
- Von Maltzan and Others v. Germany* (裁定) [GC], nos 71916/01, 71917/01 and 10260/02, ECHR 2005-V
- Wagner and J.M.W.L. v. Luxembourg*, no. 76240/01, 28 June 2007
- Waite and Kennedy v. Germany*, [GC], no. 26083/94, ECHR 1999-I
- Warsicka v. Poland*, no. 2065/03, 16 January 2007
- Weissman and others v. Romania*, no. 63945/00, ECHR 2006-VII (extracts)
- Werner v. Austria*, 24 November 1997,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7-VII
- Wettstein v. Switzerland*, no. 33958/96, ECHR 2000-XII
- Wierzbicki v. Poland*, no. 24541/94, 18 June 2002

Wiesinger v. Austria, 30 October 1991, series A no 213
Woś v. Poland, no. 22860/02, ECHR 2006-VII
Wynen v. Belgium, no. 32576/96, ECHR 2002-VI
X. v. France, 31 March 1992, Series A no. 234-C
Yagtzilar and Others v. Greece, 41727/98, ECHR 2001-XII
Yakovlev v. Russia, no. 72701/01, 15 March 2005
Yavorivskaya v. Russia, no. 34687/02, 21 July 2005
Yvon v. France, no. 44962/98, ECHR 2003-V
Z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 29392/95, ECHR 2001-V
Zagorodnikov v. Russia, no. 66941/01, 7 June 2007
Zalli v. Albania (裁定), no. 52531/07, 8 February 2011
Zander v. Sweden, 25 November 1993, Series A no. 279-B
Zapletal v. the Czech Republic (裁定), no. 12720/06, 30 November 2010
Ziegler v. Switzerland, no. 33499/96, 21 February 2002
Zielinski and Pradal and Gonzalez and Others v. France [GC], nos. 24846/94 and 34165/96 to 34173/96, ECHR 1999-VII
Zimmermann and Steiner v. Switzerland, 13 July 1983, Series A no. 66
Zollmann v. the United Kingdom, (裁定), no. 62902/00, ECHR 2003-XII
Zolotas v. Greece, no. 38240/02, 2 June 2005.
Zumtobel v. Austria, 21 September 1993, Series A no. 268-A
Zvolsky et Zvolska v. Czech Republic, no. 46129/99, ECHR 2002-IX